

論民主及其它

新文化社出版



上海工人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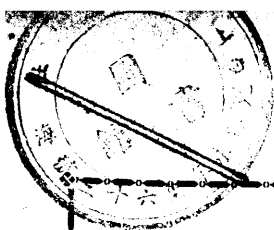


新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致

本書限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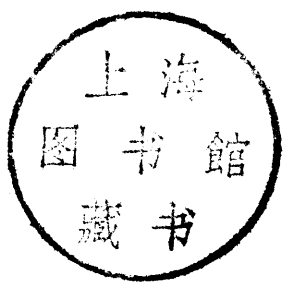
高云樵 甲寅年



論民主及其宅

著者 夫一 · 門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7954B

新文化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論 民 主 及 其 它

著 者 星 門 · 一 夫 等

出 版 處 新 文 化 社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每 冊 實 價 國 幣 肆 角 伍 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目錄

領袖論

- 一 領袖與天才
- 二 領袖與環境
- 三 領袖與羣衆
- 四 領袖與訓練

論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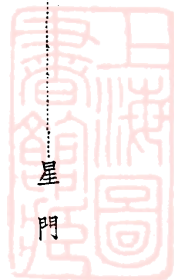
- 一 民主的本質
- 二 各國民主政治的經驗
- 三 中國民主政治的經驗
- 四 民主的訓練與開展

論自由

- 一 什麼是自由
- 二 個人的自由從集體中獲得的
- 三 自由是奮鬥得來的
- 四 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過程中民衆應有的自由

民衆運動論

- 一 民衆運動的本質
- 二 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
- 三 中國當前民衆運動的動向



星門

蕭行

一夫

吳大現

論集體生活

——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的檢討——

- 一 生活的個人與社會的個人
- 二 個人與社會是一個過程的兩個面
- 三 中國人本有的『特性』是舊社會的意識形態
- 四 集體的努力才能改造社會
- 五 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同時也改造了自己

中國統一論

——論——

- 一 過去的中國未曾統一
- 二 中國爲什麼以前沒有統一
- 三 中國統一的過程
- 四 怎樣加強統一

論婦女

- 一 國家沒有解放婦女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 二 國家解放以後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 三 過去中國婦女運動的經驗
- 四 中國婦女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任務



領袖論

星



普通所謂領袖，就是在辦事方面比人能幹，或在事業的成就方面比人偉大，為一時代或一團體所擁護或服從的人。文藝界有文藝的領袖，學術界有學術的領袖，法西斯運動，民主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中間，也各有領袖，甚至賭博，流氓與強盜土匪各團體內，也各有他們的領袖。雖然各種領袖對於一般社會的影響，各各不同，而他在自己的團體範圍內被認為領袖，那是一樣的。但這種領袖的特點是什麼？是不是天生成的？在政治方面，法西斯領袖與社會主義領袖，其性質和作用是否是一樣的？在社會上有許多青年——特別是受聖賢英雄思想所薰陶出來的青年——多希望將來變成「領袖人物」。但如何才能成為真正的領袖？這種問題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一 領袖與天才

一般的意見：領袖是天才的表現。凡是在社會上飛黃騰達，被尊為領袖的，一定是有出人頭地的天才。反之，沒沒無聞的，總是庸才，不配做率領羣倫的領袖。固然，人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書籍，訓練，交朋友，都有相當影響。但只有天才，能利用社會給他的各種機會，扶搖直上。庸人則雖有機會也不會運用。所以領袖為人佩服擁護或服從，全在乎他有超人的天才。

有了這種「天才論」才產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論」。人就分爲兩種：一種是得天獨厚的天才，一種是專供役使的愚人。但奇怪的天才和愚人之分，却每每爲階級基礎所規定。例如鄉下人終歲勤勞還不能足衣食，這就因爲他「愚笨」。工人們與傭工們，應當服從富有的主子，永遠奉他們做領袖，而自己永遠是奴隸。這就因爲沒有天才。中國古代「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的理論根據，也在這裏。

不獨一部分中國人如此想法，帝國主義也用這套理論，要當仁不讓地做世界弱小民族的領袖。因爲白種人有「創造的天才」，有「征服世界的天才」，所以有傳播西方「文明」到「黑暗世界」去的天職。但現在「後起之秀」的日本，產業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也提出大和民族高於一切民族的口號，開始惟我獨尊的，要做東亞的領袖。至於法西斯以人種爲文化前提，以最高領袖爲「超人」，以絕對服從領袖爲社會進步之要素，尤爲彰明較著，不必贅述了。但是，領袖是不是由於天才，而天才者是不是一定會做領袖，這問題得首先弄清楚：不然，我們的論旨，將越發糊塗了。

就以科學發明與發現爲例罷：發明固然需要天才，但天才不是憑空就可發明的，一定要有社會的條件。即一定要先有了種種發明，做後來發明的根據。譬如，發明電報，是根據已有的電線，電池文字等等，不然電報即無從發明起。西人說「需要是發明之母。」這話也只一半對。因爲雖然需要，而沒有可資發明的社會條件，即不能有新的發明。又如原始民族對於減低死亡率的需要，怕比我們還要急切。但因爲沒有生物學，生理學，和化學等等，對於醫學，不能有所發明。結果，只能訴之於魔術禱告。這也許是原始民族天才的發明，但實在又與神道設教的社會形態相適應的。所以發明雖靠天才，但沒有社會條件，不能發明什麼。等到社會條件齊備了，歷史將使某一新物質或新現象出現，而由於實踐與歷史發展相吻合的人，負担起這一使命，於是有所謂發明。發明不全靠天才，於此可見。而且也有兩個以上的人，不謀而合的

在同時有同樣的發明與發現。據 Dorothy Thomas 的調查，就有一百五十種之多（註一）但所有的發明家，不是全出名的什麼領袖。

有的科學發明家與發現家，因為所做的事「不合時宜」，非獨不甚出名，不受人尊重，反而因之得禍。最顯著的例，是意大利的 Galileo。他發現了地球不是世界中心，而是繞着太陽轉的，但竟犯了宗教家的忌，結果被處死刑。易卜生的「國民公敵」劇本中的醫生，發現人民洗澡水有毒，勸阻人民不要去洗澡，想予以改革，但結果反被人民唾罵攻擊，被認為「國民公敵」。然而事實他們竟因此受毒生病。這一切都證明天才不一定能做領袖。

到了產業革命以後，發明家最為新興資本家的尊敬，因為他們能為資本家豐富財產。資本家給他們的酬報，就在社會上予以褒揚，叫大眾都來敬仰。這是資本家的一種狡計：一方面使才能智識歸於個人，轉而鞏固其私有產權。一方面使大眾忘却自己創造的才能。其實真正發明家不一定有名至實歸的。譬如：

「梅則納·許華茲——發明家的寡妻——未能得到足夠資金，去依照她丈夫的計劃製一架新的飛船。齊伯林伯爵就揀了這個時候來請求購買此項專利權，這位寡婦這時候已經沒有旁的路可走了。在簽訂合同的那一天，她收到一萬五千馬克……」

「沒有人再想到死去的發明人許華茲了，也不想到最初的飛船發明人曹爾珂夫斯基了。但齊伯林公司做了很好的買賣。皇朝的驕子，愷撒的寵臣齊伯林伯爵，享受了最大的榮譽。國家給他以經濟上的幫助，把飛船大吹大播地宣傳，當作國家的光榮，同時因此而得到了巨量的餽贈品。」

「最近飛抵莫斯科的飛船上面寫着齊伯林字樣，大衛·許華茲——他的專利權是被伯爵以這樣便宜的

註一 二人以上獨立創造的發明和發現表見烏格朋，社會變遷第五章附，廿四年商務版。

價格買去的——名字，是完全不提了。」（註二）

可是資本主義一到了最近的崩潰的階段，發明的天才，便不需要。有許多發明，因為不適應現存的經濟機構，能弄
得非銷燬不可。例如「一位維也納化學家賓高博士（Dr. Binger）發明一種『永用火柴』（eternal match）這
種火柴可以連用一百次。瑞士火柴公司老板克魯格（Kreuger）恐怕這種發明會影響到他的營業，竟想盡方法，把
專利權買來，把它燬滅。」（註三）

蘇聯建設了社會主義以來，許多工人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受了國家的鼓勵，變成了發明家。美國的新聞記者維
拉特（Oswald G. Villard）在他所著的一本關於蘇聯的書內曾寫道：「我懷疑是否在美國會有任何一個工廠，
一年之中工人繳進發明及建議到達了一千四百件。但在蘇聯是十分普通的事。勞動者羣的工作創造性的發展，是蘇
聯政權的基礎之一。」（註四）

最出名的蘇聯工人發明家，要算斯泰哈諾夫了。

「他是由工人自己發明，自動參加，事前既不會有技師工程師來擬具方案，事後也不會有工廠管理員來督
促指揮，因為他是一個勞動者自發的運動，所以他決不能夠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只有勞動者自己成爲主人，能
够自覺地來參加社會生產工作，同時勞動者的文化和技術水準已經普遍提高了的蘇聯，纔有產生斯泰哈諾夫

註二 《蘇聯的發明故事廿五年生活（中文版）》二四——五頁。

註三 同上二二六頁。

註四 同上五十九頁。

運動的可能。」（註五）

現在他已成了蘇聯的偉大領袖了。

一般人以為中國人沒有發明的天才，但我們也有過偉大的發明：如指南針，紙，印刷術，都遠在西洋各國之先，中國一部文化史，足證明中國的天才衆多。不過中國社會，至今還沒有脫却封建勢力，發明家不能發展其天才，使發明事業有長足的進步。因為封建社會裏，「立國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藝——而「術數之士，不能起衰振弱」，一切天才的發明都被壓沒了，更談不到做領袖。

以上證明的，是發明的天才，大都受社會的歷史環境所支配的。現在再以藝術為例：我們知道藝術的創造與發展，除了天才以外，同樣須有社會條件。以圖畫來說罷。第一，要有日積月累的技巧的修養。這種技巧，不是畫家一旦心血來潮，就可得到的，一定要名師指點精心習練。使技巧能運用自如，才有做藝術界的領袖的希望。但是畫家的藝術，無論如何精進，作風無論如何獨創，社會上沒有藝術的「風氣」，藝術家也不會受人歡迎。所謂「懷才不遇」的悲哀，就在這裏發生。第三，偉大的作品，是偉大的時代的表徵，是大衆的意象的構成。藝術家不在作品裏放上這時代的因素，那作品決不會有生命。

再次，以人羣智力與社會組織的關係，來看領袖與天才的關係。在一人羣裏，在其智力的分佈狀態裏，任何一項智力特質，總適合於常態可能曲線的。（Normal Probability Curve）很少人處於上智，也很少人處於下愚，而大多數是中才。但人羣在社會組織中的分配，決不與他們智力的分佈相吻合。例如軍隊，最高領袖是總司令，以下是少數上一軍級，官其次是較多的下級軍官，最下層是極大多數的兵士。他的組織是金字塔式的。我們望而知極大多數的兵

士並不全是智力處於下愚的，而同級軍官中的智力也決不全都一樣。他們的升級，是依服務的年限與上級是否有缺額而定，只要總司令不有意外或去職，下面的軍官，雖有天大的本領，也得唯命是從，否則即犯了軍紀，要受軍法處分。這種組織，不獨軍隊如此，其他一切機關也莫不如此，不過其間阻止上升的方式，略有不同罷了。

由上面事實看來，領袖與天才的關係，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那樣密切。領袖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天才問題。我們要研究領袖，不得不從天才以外，到社會環境中去探討。

二 領袖與環境

社會環境有種種方式來限制或推動領袖的發展。各人先天的遺傳，那是一種本能的衝動。它的發展，是在社會生活過程中，依照社會的風俗格式，而變成了各人的複雜的習慣，和個性。所以他們不同的習慣與個性，可以說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的反映。做工程師，做文學家，做和尚，軍人，這並不是先天決定的，是依各人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同樣一個人，出名與否，也更看環境而定。一個鄉下的領袖（紳士，村長等）一到了大城市裏，只好「叨陪末座」。反過來說，在大城市裏失敗的巨商，富紳，本已弄得走頭無路，被人棄如敝屣，但一到鄉下，依然是紳董闊老，被推為領袖了。

在每個種族裏，天才之數較多，而領袖總佔少數。而天才能否出名成為領袖，更要由社會的與歷史的環境來決定。所以一時代領袖的多少，是一時代社會環境的反映，不能說是一個種族優劣的標準。為使這一層意思，更為顯豁。我們且來用個譬喻：一農夫在地面上散播種子，有稻，有麥，有豆，有高粱棉花等種子。每一塊地方，都散播了各種各樣的種子，而地面有山地，沙地，濕地，乾地之別。等到收穫時候，各地的成績，就完全不同。有的只出一兩種，有的一種也不出。這種情形與種族在社會環境中表現，有點相仿。種子比之於種族，收穫比之於領袖，而各種土地，即社會環境。

天才可是可貴的，但決不是奇蹟。一個有文學天才沒有識字讀書機會，那也祇有湮沒，無從發現。

我們研究領袖的發展，和他努力的成績，應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社會環境的橫剖面，來看環境給領袖發展的機會與限制；一是從社會環境的縱剖面來看，一個環境的變遷，對於領袖的影響。

社會環境的橫剖面，對領袖發展的關係最大的，恐怕要算階級問題了。領袖發展的機會，常受階級性的限制。在封建社會裏，有許多領袖是世襲的。不管他天資如何，訓練如何，他可託「祖先餘蔭」去「升官發財」或「把持文壇」。因為這種「封建領袖」根本沒有「出類拔萃」的特質，所以不得不用種種儀式，與羣衆建設了距離。儀式愈隆重，則與平民距離愈遠，而領袖的地位也顯得愈高了。雖然說「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雖然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是這不過是一種安定民心的「宣撫」政策。倘若種田的老百姓能「平地一聲雷」做了「出將入相」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那真是歷史的奇蹟。在中國祇有封建制破壞——不是根本的崩潰——時期，偶一有之，如漢高出身亭長，洪武出身牧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世襲的領袖雖然取消，但有經濟勢力來限制個人的活動。一個工人的兒子，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長大以後除做工以外，少有第二條出路。一個富翁或要人的兒子，不管天資如何，大學畢業，可以出洋留學，回來依然可靠傳統的勢力，做社會領袖，或掌理國家大事。

在一個團體裏也是如此，不同國籍的辦事員，如屬於弱小民族的，無論如何精明強幹，總難升為領袖。而國勢強盛的國民則處處高居要職，指揮一切。美國鐵路上睡車的茶房，大都由黑人充當，我親身遇見過四個茶房，都有「某某大學哲學博士」或「科學博士」的頭銜，但因為是黑人，博士尊銜，依然「賣不了錢」，只得在擦皮鞋與槓行李這些事上，去表現他們的天才。德國有許多猶太人，在經濟界，政界，學術界裏本占有領袖的地位，但法西斯蒂一獲得到政權，將所有做領袖的猶太人，全用殘酷的手段給剷除了。

只有在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裏，各種各樣的人才才有平等發展的機會，才能人盡其才而表現於工作上。因為那是以國家為一個大團體，內部分工合作的機構，雖較為複雜衆多，而個人工作的範圍，因為沒有了階級的限制，却寬大的多，個人顯示才能的機會加多，埋沒英才的遭遇便減少了。蘇聯的領袖們，有許多是工農階級出來的，而世界的領袖，也比別國為多，這便是一例。這是階級森嚴的別的國家所夢想不到的。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我們發現一時代的領袖的數量及其出現的姿態，全由歷史環境決定的。在「國泰民安」昇平之世，既無內亂，又無敵國外患，則「英雄無用武之地」，社會上所擁護與贊揚的，將不是軍人而是經綸之才。歷史上領袖，好像高地上屹立着的幾棵大樹。一眼看去，非常出類拔萃，但實際不過是它們站在最高的邊際上，易受人們注意吧了。然無丘壑巨榛，平地叢林，與之襯托映輝，便難顯其雄偉。童山孤樹，危岩喬松，不但易於摧折，且復顯出孤單可憐。領袖在歷史上出現，又如河流上的水量，隨着河的環境而改變。某一段河流的河身深闊，所容的水量當然很多，某一段的河身窄狹，或變成淺灘，或有大石層出現，那河面上的水，顯然很淺，好像要乾涸的樣子。這現象仔細加以研究，我們知道大量的水流，雖不在河面上流，但它是經過了沙層或石層底下流去了，即使河身深闊的地方，也不能沒有水往地層下流過去的。而且水流的緩急，也要看河道的地位而決定。中流的水更較靠近兩岸的水，流的迅速，而河身地勢的平坦與峻峭也決定水流的緩急。歷史上某階段的領袖名人的稀少與衆多，及其出現的姿態，頗有像河道中的水流一樣；不過歷史的條件更為錯綜複雜，不能像河流一樣容易研究罷了。如意大利多數名畫家集中在十五世紀出現，而英國的許多戲劇家，則集中在十六世紀末葉，像 Shakespeare, Beaumont, Fletcher, Ford, Webster, Massinger and Jonson 等的生日都在二十三年中間出現。以前數世紀所產生的戲劇家，不獨為數不多，而且作品也沒有十六世紀那樣偉大。這就可見天才名家與歷史交織的關係。

130.5 6077
21371

美國的作家也有同樣的集中的事實根據。Prof. McMaster 的歷史（第一冊七六頁）我們知道所有歷史上偉大的作家，全是在大革命時代出現的，而且沒有例外。「和平宣布後不到一年生了 Irving 在華盛頓就職的同年。Cooper 去世了， Halleck 在下一年生的， Prescott 是華盛頓退職的一年生的，憲法宣佈後五年生了 Bryant。十九世紀的第一年即生了 Bancroft，在以後的十年中就有 Emerson, Willis, Longfellow, Whittier, Holmes, Hawthorne and Poe 接着去世了。」（註六）

從我們中國歷史看來，學術界的領袖，要以春秋戰國的大轉變時代為最多。以後封建社會的基礎穩定下來，孔子成為唯一的學術思想的領袖。二千多年以來學術界的領袖們，只能在儒學的範圍內轉圈子。因為社會變化不大，政治上也沒有革命的領袖。只有換朝易代的大變化時候出了幾個武將。至於科學發明的領袖，在前面已經講過就根本談不到了。

領袖們不是在歷史上永遠被人擁護崇拜的，只要時代一轉變，即使是「萬世師表」「至尊先師」的大領袖孔老夫子，到五四時代，被人攻擊得體無完膚。不獨近代「維新時代」的領袖們，一轉眼變為老古董，就是五四時代「青年界的導師」「知識界的領袖」在目前的大轉變時代中，也不知轉變到那裏去了。

但是因為目前是中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也容易有各種姿態的領袖出現。這就是所謂『亂世出英雄』而且新社會的發展方面較舊社會更為廣大複雜，所以開拓的範圍也更多。人才的需要，較為迫切。於是沒有什有訓練的青年，和「學者」有時也竟一躍而居要津，儼然是個領袖。這現象，從表面上看來，好像不合理的，但實際上却是最合理的。因

註六 引自 C. H. Coole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N. Y., Henry Holt and Co. 1930

爲社會的變動，地位權勢的限制較鬆，個人的才能的發展機會較多。祇有眞有能力的人，才能在大奮鬥中生長爲領袖。但其間不是沒有乘機取巧的領袖，他不從羣衆中生長，而從抓住羣衆中僥倖獲得他的地位。這種領袖，有時如法國大革命時的布里索一樣，成爲歷史的罪人，有時如托洛斯基一樣，無法保持他過去的地位。在學術界這情形更爲明顯。中國留學生，在外國時，個別講來，比其他各國學生也不相上下。有時竟超過他們，回國以後，當了教授，當初還可販賣一些洋貨，向知識界裏誇躍。因之尊爲學術界權威。但一做權威，便成萬能：學校行政，既需參加，政治活動，又得干預。所謂學術研究，早已沒有工夫。十年二十年之後，不爲政客，便爲學術流氓。眞正做學術界領袖的，却是鳳毛麟角。這種現象，也是一個轉形期社會裏所必有的。

上面討論中所要說明的，就是領袖是時勢造成的，也是受時勢的限制與推倒的，至於某人能在某時居於領袖地位，這也不過適逢其會罷了。

三 領袖與羣衆

領袖是從羣衆生長而爲羣衆所擁護的，領袖與羣衆是不能分隔的。固然過去也有「一將成功萬骨枯」的話來形容領袖所產生的因素，但這是封建社會個人英雄主義的說法，眞正的領袖，決不是犧牲羣衆的利益，來創造自己的成功——地盤的。恰恰相反，領袖的成敗，是建築在羣衆的利益上的爭得或放棄這一關鍵上。

但學術界的領袖與政治領袖，其間對於羣衆的關係，稍有不同。學術領袖的貢獻是學術思想，他與羣衆關係，往往由文字傳達。羣衆和他不一定有嚴密的組織關係，然而他給羣衆的影響，深遠而且闊大。政治領袖的貢獻，往往偏於直接行動，他和羣衆越保有緊密的組織關係，他越能發揮力量。羣衆擁護學術領袖，注意於他那學術的成績，和他做的需

要相適合。著作是羣衆擁護的目標，即使他死了，他還被擁護。政治領袖之被擁護，是在他洞悉羣衆的需要，能在行動方面指導羣衆，使達到羣衆所要求的目的。倘若他死了，羣衆一定會擁護另一個領袖來承繼他的任務。至於他死後，羣衆還擁護他的政治理論，那是認他爲學術領袖，而非政治領袖了。所以政治領袖，是行動的領袖；——更正確的說，是理論實踐領化了的袖——與羣衆特別保有密切關係，他的成敗，全視擁護的羣衆的多少，與當時當地的運動是否建築在民衆的利益之上爲斷。和羅斯福總統競選失敗的共和黨候補總統雖然不一定是他的政策真的失敗（因爲在資本主義的國度裏，正真爲民衆的政策，誰都說不上。）但可以說在這一階段的民衆的需要，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是比較和它的接近。

研究學術的人，注意力往往集中於研究的本身，雖然他的最後目的也還在貢獻給羣衆。但他很可不必於研究之外，另做一番「以廣招徠」的羣衆工作。要緊的是「拿出貨色」來。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於羣衆。先有羣衆的援助，才能得到政權，才能維持政權。所以有政治野心而沒有羣衆或缺少羣衆的政客，就不得不用威逼利誘的手段，去拉攏羣衆。拉攏的方法，就是開定期支票。至於支票能否兌現，那是要等到期再說了。羣衆如其看不清這點，勢必被利用得焦頭爛額而無法補償。關於政治領袖與羣衆的關係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再來詳細討論一番。

政治領袖大致可分爲反時代的領袖與時代的領袖兩者。當然，除此以外也有適逢其會，做了現成的領袖的。如武昌起義時候，據說有一位高級軍官，嚇得躲在牀底下，被下級軍官們硬拉出來，做了領袖，後來竟成「開國元勳。」還有奴顏婢膝，仰人鼻息，自甘爲「傀儡領袖」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反時代領袖的尾巴，是不值得一論的。

我們先從社會的演變上，來考察這兩者的性質。當資本主義危機不斷地繼續增長，臨到它本身總崩潰的前夜，按照社會變遷的原則來說，那應該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起來代替的。而且占有地球六分之一的羣衆，已起來了執行這偉

大的使命，爲人類爲文化開展了更高一級的光明的前程。這是時代趨向，這是歷史演化的法則，誰也沒法否定的。自然它所經過的歷程，決不會像我們所設定的原則那樣單純，它是更複雜，更曲折。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爲要保存他們本身無可挽回的厄運，却極力阻撓大時代的演進，作最後的掙扎。希望能對勞動階級延長剝削的機會。這種掙扎，是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統治階級一致的掙扎，而表現的最顯著最殘酷的，要算是法西斯主義運動。法西斯的領袖，在其本質上講，是反時代的領袖。

專從表面的領袖的技巧上來看，反時代的領袖，與時代的領袖，也許看不出什麼分別。可以標榜「民主主義」的美國「學生」們，往往以社會主義的領袖與法西斯主義的領袖相提並論，「一樣」稱他們爲「獨裁」，以爲他們是用「一樣」的技巧，得到羣衆的擁護。俄國的領袖們對於羣衆指示了光明前途，而德國的領袖們對羣衆也說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俄國的羣衆對史太林歡呼，德國的羣衆也對希特勒歡呼。但仔細研究，就可看出這兩種領袖，是截然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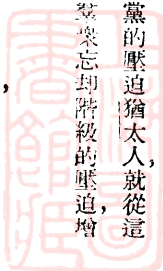
當資本主義總崩潰的危機日迫，統治階級加強時候，勞苦大眾起來反抗，威脅統治階級政權的時候，就是兩個階級短兵相接的時候。這時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便主張用暴力鎮壓勞工，這時法西斯黨，便應運而生。它一面利用了勞工運動內部的破綻，威逼利誘，收買動搖份子；一面對擴大民主政黨的弱點，打擊議會政治，使統治階級越發動搖，不得不擁護法西斯黨上台。所以意德法西斯黨取得政權，不是用武力而是統治階級雙手奉送給它的。（註七）但從其本質上說來，還是軍事法西與資本巨頭的一個結合。

法西斯黨獲得政治以後，一面便用殘酷手段，束縛了勞工大眾，但有時也以資本巨頭爲中心的，推行社會政策欺

騙勞工大眾，另一面便對外侵略，來緩和國內的矛盾，藉以維持政權。它所標榜的，便是種族主義。使種族的優越感神聖化，與神權相結合。並將這「神權」集中於一二人身上，從而主張絕對服從領袖。德國法西斯黨的壓迫猶太人，就從這一種族的優越感上出發的，但其作用，却是將經濟危機的責任，加在猶太人身上，以便搶奪。使羣衆忘却階級的壓迫，增強國族間的仇恨。絕對服從領袖，在這一基礎上，也就生了效。

但這效力是不能永久的。於是又不得不用「不斷侵略法」，向國外擴張勢力，或用武力，或用外交，攫取弱小民族的利益，並向其他資本主義國要求重分殖民地。於是他們向羣衆宣傳說，「只有擁護領袖及其政策，可使民富國強。」其實這樣做，領袖的地位是否穩固呢？我們堅決的可回答一個不字。因為種族主義，根本是使勞苦大眾將本身利益犧牲於資本巨頭的。羣衆生活只有一天天更加困難，而以牛奶代大砲的結果，作為侵略的犧牲的，也還是勞苦大眾。在這裏，所謂領袖完全是愚弄羣衆，欺騙羣衆，剝削羣衆的利益的。是反時代的領袖。

真正的領袖是能根據客觀事實，領着極大多數羣衆，向大時代邁進的領袖。這就是總理所謂「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的先知先覺。我們先以蔣委員長來看罷。在抗戰以後，羣衆對他的擁護，比抗戰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以前有人懷疑他，也有人反對他，但自從他主張抗戰以後，全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都一致熱烈地擁護他了。因為他的主張「貫徹抗戰到底」是代表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他知道「我們的民衆都確信：偉大的中華民族決無被滅亡或屈服之理。」所以他能領導全國民衆，一致團結，共同努力，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同時中共領袖們的更能把握這時代的動向，在西安事變中，竟積極解救這今日的抗日的統帥蔣委員長，主張連各黨各派抗日統一戰線。他們這一主張，是從兩點上出發的。一，他們的行動是生根於全國的勞苦大眾的，他們最熟稔勞苦大眾的心理，把握了勞苦大眾的抗日的一致要求。二，他們對於中國資產性的民主革命的任務，始終不會放棄過。土地



革命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相反，而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工作。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取獨佔形態的侵略之下，民族資產階級連在各帝國主義均勢下，求個喘息的機會，或變為賣辦，都不可能了，同樣也有一致抗日的要求，這正是歷史賦予中國完成資產性的民主革命的時候，而蔣委員長無疑是負起這一任務的適當代表人物。所以他們敢于這麼做，並且暫時放棄了蘇維埃的主張。在此，我們可以說，能洞悉時代的客觀事實，並能知道全國羣衆真正的需要的，那就是時代的領袖。

當蘇俄共黨得到政權的時候，各地反動勢力受帝國主義的協助，都膨脹起來，國內各地弱小民族，尚在觀望中，蘇俄的政權，大有千鈞一髮之勢。那時史大林爲民族委員長，努力推行民族自決政策，使蘇俄各民族羣衆，瞭解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有了偉大的出路，即先後打倒本民族的反動份子，來參加蘇維埃，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日益擴大。（註八）這加速大時代前進的力量，就是領袖。

領袖的偉大，在乎他能對於羣衆的需要，有先見之明，並且能運用羣衆力量，客觀條件，完成歷史的任務。蘇聯一個黨員說：「我與工人們一起，可以分析一廠的事情，做幾個月的計劃。別人如在中央委員會裏的，比我聰明得多了，他們能爲廣大的羣衆，計劃好幾年的事情。史大林是我們最能幹的，他看得見我們的前程與國際時事的相互關係，及其進展的每一個步驟，好像一個人由氣球上看到地面上一樣。但是中央委員會的人們採納他的分析，並不是因爲他是史大林，只因爲他的分析清楚，而且有事實作證，所以才使人心悅誠服。」（註九）

我們很知道像史大林所說的「『歷史是大人物所創造的』說法已成過去了。」領袖對於歷史的貢獻，雖然不能

註八 參巴比塞史大林：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一九三五年（英文版）一〇一頁。

註九 A. L. Strong,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 N. Y. 1934 p. p. 17-8

像 Carlyle 所說那樣偉大(註十)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領袖——領導時代的領袖——占着相對的重要地位。偉大的領袖，能先看到時勢的進展，而且能迎頭趕上去，安排一切，以利大時代的前進。他們不是憑空創造時勢，他們不過比羣衆先見一着，而能領導羣衆向前邁進。倘若沒有列寧史太林，俄國也一定要有革命的，但俄國革命初期，所處境况非常危險，應付偶有失宜，即有不測之變。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列寧史太林，雖然可說俄國革命終究也會成功，但那一次也未必成功，或有一個反列寧反史太林，因之加強了統治階級的團結，民衆要多受許多時候的壓迫也說不定。德國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成功後，不能維持政權的結果，是一個很好是反證。「歷史如一條大河一樣，他流的方向，是他源頭的形勢所決定的。人力所能作的，就是疏通他，以加快他的流或防範他，以延緩他的流。」(註十一)領導時代的領袖，不能發明歷史的，但他能組織歷史，加速歷史的過馳。

四 領袖的訓練

中西文化接觸以前，中國的社會較爲固定，變遷不很顯著，個人的行爲標準與發展的前程，也是相當固定的。所發生的事實，差不多都有「前例可援」，最好處置的方法，就是「墨守成規」，領袖們辦事的理想，便是「按部就班，照例辦去」。而他自己也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爲他的最大成績，結果便是「因循苟且」。倘若有人要「力圖改革」，他就會得到「標新立異」、「好大喜功」與「勞民傷財」的罪名。在這種社會制裁之下，普通民衆要產生「出類拔萃」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倘若偶有產生，只好用命運論來解釋了。不是說他「八字」「風水」就是「天地鍾靈，山

註十 參看他的著作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文版)商務民廿一年

註十一 馮友蘭秦漢歷史哲學哲學詳論六卷，三期廿四年九月北平哲學評論社，第三頁。

川毓秀」或「異人傳授」而「風水」可以選擇「修心」就可「補相」這就是道地的國粹領導訓練論。

我們研究領袖，不是研究領袖個人「特質」，是研究領袖與羣衆的關係。因為領袖不過是羣衆的代表，不能離開羣衆獨立的。羣衆擁護領袖，不是爲領袖，而是爲羣衆本身的利益。倘若領袖不能滿足羣衆的希望，羣衆即會設法離開他或推倒他，而另擁護新領袖。

主觀的力量，產生於客觀的基礎上，客觀的基礎越鞏固，這主觀的力量也越發揮出來，於是領袖也就出生了。領袖也就能率領羣衆前進了。這可以說領袖也爲時代與羣衆所領導，這又可說領袖和時代羣衆的對立和矛盾的統一與交光互感。史太林說：

「領袖的技術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一個領袖決不能落在運動後面，因爲這樣就離開羣衆孤立了；但是他又不能一直往前衝，因爲一直往前衝，就要失却了與羣衆的接觸。要領導羣衆的人，一定要與兩道戰線鬥爭——反對落後的與往前直衝的人們。

「我們的黨是有力量的，而且是無敵的。因爲在領袖運動的時候，它知道如何維持，如何增加與幾百萬工農大眾的接觸。」（註十二）

這可說是一個時代領袖應守的規條，蘇聯訓練領袖，就是用這個方法。譬如工會或黨部的領袖，漸漸自鳴不凡而近乎官僚化的時候，工會與黨部知道他們離開羣衆太遠了，就立刻將這不凡的人們，送到平凡的環境裏，如工廠農莊等，叫他們仍做以前所做的平凡的工作，讓他們漸漸由羣衆的集體工作過程中受訓練，讓他們理會到自己並沒有什麼了不得，讓他們瞭解羣衆是不錯的，羣衆的力量是偉大的，讓他們知道領袖的標準，是對於羣衆服務的程度而定的。

他的地位是由羣衆的擁護程度來決定的，不是自鳴不凡就可提高的。等到他們瞭解了羣衆，與羣衆打成了一片，然後再調到工會或黨部裏去工作。

對於打破英雄主義，這一層，史太林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對紅軍大學畢業生演講時，也鄭重地說過：

「我們近來在行政方面與建設方面有重要的成功，這是不能否認的。但關於這一層，說是首領的功績，是領袖的功績，實在說得太多了。所有的——幾幾乎所有的——事業，都歸功於他們，這自然是錯的，不正確的。這不僅是領袖們的功績。」

領袖的偉大，決不在乎他有權力去壓制別人，也決不是他有創見，他能別出心裁。領袖的偉大，在乎他能瞭解、能分析、能綜合羣衆的集體意志。史太林在蘇聯的地位比誰都高，各地羣衆向他歡呼，引證他的言論，決不是像德國羣衆對希特勒一樣，倘若不如此做就要被捉到德國牢監裏去的。羣衆不打聽史太林的意志如何，他們要知的是史太林如何分析和綜合問題的各方面的關係。史太林的政治報告，可說沒有一句是他自己創造的，報告內所有的重要討論，早已是千百萬羣衆說過或想要說的話，但是他說的比誰都週到，比誰都完善。他分析問題，指示它的起源與結束，及中間經過的步驟。他對農民指示集體農業的過程，並能明白指出他們今天在一個階段上，應該怎麼做。他對工業領袖，指示當前工業的根本任務是什麼及爲什麼。他對黨的代表大會，指示在蘇聯未來幾年中的各種重要任務。他所指示的，都是根據他們的報告與知識，不過將他們的問題綜合起來，指出本國問題與世界各種關係與意義。問題與政策，並不是新鮮的，新鮮的就是綜合與關係。——成爲整體的。正因爲這，別人讀了他的演講，十有八九總說「這正是我要說而說不出來的，現在史太林都給我說出來了！」史太林的偉大就在這點，羣衆對他歡呼，也就在這一點。他與羣衆接觸並無儀式，也不用權力。我們知道，凡到用儀式與權力來維持領袖的地位，就是不能得到羣衆真正擁護的表現。

領袖是集體化的，「英雄主義」與「獨裁主義」的領袖是截然不同的。當外賓見史太林問起他關於蘇俄領袖獨裁的問題，他就直截了當的說：

「不，一個人決不可有個別決定，因為個人的決定，永遠或幾幾乎永遠是有偏見的。在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區域裏，應當注意許多人的意見。……三次革命的經驗，已指示給我們，凡是一百次的個人決定，有九十次是有偏見的，要受集體審查與糾正的，指導所有蘇維埃與黨部的我們的中央委員會的領袖組織，包括大約七十人，在這七十中委裏面有我們最好的技術家，我們的最聰明的專家及最瞭解各部分工作的人才。我們黨的智慧和集中在這個最高會議裏面每人可向他旁邊個人的意見或建議挑戰，每人或許供獻他自己的經驗。若不如此，專憑個人決定，那末我們的工作一定是錯誤百出了。但是因為各人互相鄭重地糾正着，我們的決定可以盡量正確了。」

（註十二）

這種表示，不是對國外宣傳用的，而是實際情形，就是對國內，也屢次表示過。譬如在一九三〇年各地黨部用政治力量，強迫農民集體化，以便誇耀該地集體化的勝利。史太林寫了一篇「被勝利所昏迷」，指示各地黨部說集體化更自動的強迫集體化，不是黨的意思，於是各地民衆大家歡呼，說這是史太林的個人創見。後來他再寫一篇文章回答，說「這種說法自然是荒謬的，我們中央委員會不允許任何人——不管是誰——有這種個人創見的舉動的。」（註十四）寫這篇回答，他自己指出也是由「中央委員會訓令邊辦的。」（註十五）

註十三 巴比塞，同上 一五〇頁。

註十四 史太林，同上 三三四頁。

註十五 同上，三二八頁。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做領袖的條件，先得看清楚大時代的羣衆運動同時，要知道這運動的勝利是有歷史的必然性的，不是反時代的。我們參加運動的目的，是想努力加速它的成功。以整個運動與自己打成一片，使自己做這時代運動鎖鍊中不可分離的一環，但也只是一環受全體的支配，盡自己的能力，與大眾配合起來，絕對地拋棄個人英雄主義，認清了總目標，則各人雖工作不同，地位不一，而工作進行的步調，自然齊一，工作的結果，便會「百慮一致，殊塗同歸」。不必自暴自棄。能做事的做事，能研究的研究。看清自己的工作對於運動的意義，有一分力努力一分，即使自己的努力，僅如油燈火一般，但是集體的油燈火，就可變成光芒萬丈的燈火，照澈了茫無邊際昏黑的大海洋。同時努力參加工作，也就是努力向大時代學習，努力在羣衆中受訓練。在工作的過程中，也改造了自己，增加了工作力量，對羣衆可以有更大的貢獻。那時候，羣衆自然會賞識你，會叫你負更大的責任。偉大的領袖，不是一天訓練成功的，也不是僥倖可以成功的。Khorin說的好：「史太林所以變成領袖，全因為他是最優越的理論家，同時也是最優越的實行家。」巴比塞說：「他所以是領袖，同時他所以成功的理由，就因為他是對的。」（註十六）

論民主

肅行

『要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首先必須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這是抗戰以來全國上下一致的要求。因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決離不開政治。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全靠堅持統一戰綫與堅持抗戰的總方針，全靠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所以臨時代表大會宣言鄭重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尤取決於民力。』並說『民衆方面則注意於能力之養成，政府方面則注意抗戰之力量，而民權之基礎，亦於此建立，則抗戰勝利之日，結束軍事，推行憲法，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爲勢固至順也。』而抗戰建國綱領特別規定『加強民衆之國家意識，使能輔助政府。』蔣委員長在參政會第一屆集會訓詞中，就以『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相勉勵。而南嶽軍事會議，又決定『政治重於軍事，民衆重於軍隊』等重要原則。第三屆參政會會議的時候，蔣委員長親任議長，一再宣言民主政治爲抗戰建國之前提。所以民主政治，是現階段中最迫切最嚴重的問題。但是什麼是民主？各國民主政治的經驗是怎樣的，我國過去的民主政治何以失敗？怎樣使全國民衆能運用民主政治，來保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種問題，都需研究民主政治的人們，大家努力檢討的。

一 民主的本質

真正的民主，不僅是「一人一票大家平等」的傳統民主，也不是要求犧牲少數來服從多數的機械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各個人在團體中互相創造，互相影響，由矛盾而造成總合的集體。有集體才能有民主，集體的意見，就是民主的意見，集體的意志就是民主的意志，集體的精神就是民主的精神，而集體的力量，就是民主的力量。集體越能團結，民主越能開展。

民主不是別人授與的，民主是人們在集體生活中自己創造的。讓我們用最簡單的委員會來說罷。這個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要尋出共同的意見，去共同辦理大家要辦的事件，這是大前提。我參加委員會，不專是供獻我的意見，倘若專門供獻意見，我可不必出席，只寫一份意見書去就行了。但是我也不僅是去聽取別人的意見，倘若這樣，我就請每人給我一份意見書好了。我們所以勞師動衆，大家參加會議的緣故，就是要大家創造一個集體意見。這個意見不獨比每一個人的個別意見好，而且還大於各個人意見的總和。因為這個集體意見，是各個人的交流互感着發揮出來的，大家都有一份在裏面。而各人所發揮的，也不僅是他本來想到的，而大部分是在討論中受了團體中各人的啓發而產生的，同時反過來，他的意見，又啓發在座各人的思維，譬如甲發表的意見，引起了在座各人乙丙丁的新意見，而乙發表了由甲啓發而想到的新意見，對於甲丙丁的思維上又起了作用，這樣不斷的進行着，結果產生了一個共同的集體意見。在這個意見中，各個人的意見都充分地代表在裏面，但要分析這集體的意見，去辨別那一部分的意見，是屬於那一個人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這是集體的。而有了集體意見以後，各個人也決不想去辨別他個人的供獻，他對人講的時候，很自然地說「這是我們的意見。」而他就是「我們」中分不開的一分子。

在這集體過程中，最主要的先決條件，就是每人應當各竭其能各盡其職。倘若有人在討論中，故意講究禮貌，而自動取消自己的意見，這是規避責任，不獨自己不能在集體中代表着，而且損害集體的發展，這是損失了民主的充分表

現倘若有人以爲『別人可以比我做得更週到，用不着我參加的。』這不是怠惰，就有誤會了。是的，團體裏各個人的意見，或許比你個人的意見高明。但主要點不在這裏，不是各個人的比較。主要點是我們聚在一起大家參加，大家供獻，各人應當盡量參加，在參加以前，你或許自己覺得沒有供獻，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只要你努力，你當然會受討論的啓發，而有新供獻，凡是參加過討論會的，都有這樣經驗的。

有的人在討論過程中，要堅持自己的主張，用種種方法，使它通過，這不是民主方法，就因爲這不是集體的主張。同時，多數的意見，並非集體的意思。譬如我與甲乙丙丁五人在會議中，倘若我得了甲乙的同意，就可以三人作爲多數通過。但是這是機械式的，丙丁就沒有代表在裏面。就是全體舉手通過了，其中有一兩個人懶得參加討論，只是舉手贊成，這種全體的意見，不是每人盡量參加造成的共同意見。各個人不能被動，所有的人都要主動，才能交流互感，創造出更偉大的共同意見。倘若各個人分頭比較個別的意見，就不是共同的思索與討論。最主要的是如何各盡所能，去討論出合乎大家需要的結論來。在討論過程中各人在那裏供獻，同時各人在那裏學習，各人發現各人不同的意見，而將各人不同的意見交織着，綜合着，統一着，成功一個集體的意見。這種對立的統一，不是互相讓步調和的統一，而是互相爭取的統一，是新的集體創造，是真正民主的表現。

所以會議的功用，不僅是聽取不同的個別意見，而是去融會貫通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創造一個總意見。各人的意見，不是固定的，而是受集體融化的。只有這樣各竭其能，各盡其職的討論，才能互相影響，大家興奮。在這樣團體討論中，臨時一人離席，或加入，整個場合就多少會有不同的感覺。這就可表示一人的變動，就可影響集體。當集體的意見創造成功以後，參加的各人，在思維上與意見上，就有了新的開展。而本有的各人的磨擦與衝突，也無形中烟消雲散了。只有這種民主的過程，可以解決許多各個人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無聊的私人鬥爭。

普通在討論會中，就怕意見分歧，得不出一個結論，其實真正民主的討論，就重在歡迎分歧的意見。因為各人意見分歧，才可各有供獻，才能在所討論的大前提之下，交織成一個更豐富的綜合與統一。所以討論的要素是在由分歧中創造一致。各個人聽見不同的意見，就要想到『多麼有趣呵，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方面，我所知道的僅是一方面，在他給了我另一面的看法，同時因為他的啓發，使我連想到還有其他方面，』這樣越討論，越作問題的內涵豐富，所以集體討論的目的，就在乎『拿出你的不同意見，加上我的不同意見，大家將各種不同的意見交織着，創造出一個更大的一致，更大的總和。有不同的對立，才能創造更大的統一。而集體的意見，不是各人個別意見的總和，在集體中已生出的力量，比個別意見的總和，更大得多，而不是數目字可以表達的，因為在討論過程中已起了質的變化，而參加的個人，在集體中已有進一步的表現，這種集體的意見，就是民主的意見。

各人在集體的過程中，就容易互相瞭解，互相同情，於是就有了互信，就可同心協力互相切磋，而且可以做到一心一德的共信地步，這是大家創造的集體的意志。我們在團體日常生活中，大家一起演化出一種共同要求的社會意志，而每個人的個別意志，自然寓於集體意志中，所以創造集體的意志，是集體意見進一步的表現。有了集體的意志，每一份子就能够與大家配合着，根據這個共同的意志而努力，而奮鬥，而犧牲。目前許多人民所以願盡全力來共赴國難，就是因為大家有了抗戰建國的集體意志，大家才能捨小我而為大我，共同努力。

但意見與意志的統一，還不過是民主過程中的一部份，此外還有集體的情感，就是集體的精神，在軍隊中就叫做士氣，在羣衆中叫做民氣。現階段中，許多國民對於抗戰建國有了共同的意見與意志，在互信共信的過程中，發揚出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精神。一方面提高了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堅定了抗戰的信心。這種集體精神，越在堅苦困難的環境，越有迫切的需要，正如蔣委員長在參政會第三屆大會開會詞中，鄭重指出『第一期抗戰是精神與物質並重，第二期

抗戰中，精神的重要更過於物質，要發揮抗戰的力量，不僅要振作精神，集中精神，而且要以精神為主，物質為用，必先提高全國國民，堅強奮發的精神，然後方能克服艱難，打破敵人，完成抗戰的使命，『但是這種民族精神，不是神祕的魔術，可以用法術召來的，也不是一紙命令，就可產生，這是集體的精神，是人民在集體生活中自然發生的真誠純一的精神，沒有集體，就沒有這種精神。』

隨着集體意志與集體精神發揮出來的，是集體的力量，就是普通所謂『羣策衆力』。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就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知識來應付這空前的國難，抗戰能否勝利，全在乎我們有沒有不屈不撓長期持久的精神，有沒有全國一致愈戰愈奮的努力。這種力量，先要將全國人民變成一個大集體，大家起來，才能打通政府和人民的意志，集中政府和人民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正如蔣委員長指出的『較之提高前綫上官兵勇敢犧牲的精神，還要大過十倍』（參看第三屆開會詞）但是直到現在這一種力量，還沒有發揮出來，直到現在，內地人民，還有許多人不知道抗戰的重要性，還覺得抗戰與他們沒有切身的關係，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成為集體，對於抗戰的使命與前途，還沒有瞭解的機會，那裏還談得到這偉大的集體力量。等到每人能够參加了國家大集體的生活，使他們覺得是民族中分不開的一分子，使他們明瞭抗戰建國的需要，在國家危急存亡時候，自然變成他們的切膚之痛，他們對抗戰的努力，就覺得患難與同榮辱與共，而變成自動的迫切要求。所以只有在民主的集團中，各個人才能集中意志，團結力量，一心一德，為國家效命，發揮偉大的集體力量。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一種格式，不是一種老死不變的制度。民主是一種方法，一種過程，民主政治，不僅是政權的分散，由寡頭政治分散為全民政治，民主又是一種集中的過程，使全國人民團結為大集體，使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變成一個人，使各人的意志與力量變成一個集體總意志，一個集體的總力量。其實民主不僅是分散，也不僅是

集中，而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民衆靠着它來組織，靠着它來統一全國人心，團結全國意志，增強政府和人民的力量。民主政治，不是由立法來造成的，立法不過是民主的端倪。民主政治是在集體生活中養成的，民主的使命是開展人們潛在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只能在民主的集體生活中開展出來。

二 各國民主政治的經驗

以上是泛論民主本質，現在我們討論各國民主政治的經驗。我們從歷史上知道，民主政治是推翻封建制度後，取而代之的一種制度。而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社會上經濟制度的變遷是分不開的，因為「經濟一有變動，則全部巨大的上層建築，必隨之而起緩慢的或急劇的變革。」（註一）我們知道當時在封建制度崩潰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已建立了相當的基礎，並且發展得非常迅速，同時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可以壓倒封建貴族，所以產生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如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等，推倒了封建勢力的壓迫，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這種民主政治，可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雖然那時的民主革命所標榜的是全民的自由平等與博愛，但是政權建立以後，所享受的，不是全民而是資產階級。他們當時所以用全民的口號來號召革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推翻封建勢力，一定要得到民衆的援助才能做到，而同時有的民主政權，也向全體民衆開展着，如選舉權等，在革命成功後不獨資產階級有選舉權，而全體民衆也得到了選舉權。而勞動大衆所以擁護資產階級革命的，因為在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在歷史的條件之下，只有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時候，資產階級是有進步性的，他們當時的呼聲，符合大衆的需要，而勞苦大衆，也因之漸漸脫離了農奴的束縛，而轉變為行動較為自由的工人。但是革命成功以後，所

有爭取來的民主政權，大多旁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一切民主的設施，如言論出版的自由，只有資產階級可以享受，爲只有他們握有生產工具，連生產言論的工具也包括在內。表面上雖有全民民主政治的形式，而其內容已變成資產階級自由榨取的政治工具了。其實澈底的民主制度，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本是不可能的。(註二)

但在初期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勞動大眾所受的壓迫，還沒有像現在那樣嚴重，他們還有在某種程度內，可以根據法律，組織自己的政黨，爲自己生活的改善而奮鬥，而資產階級也往往用『社會改良政策』，自動改善些勞動大眾的生活，藉以阻止勞動運動，像德國俾斯麥的政策。但後來在自由競爭的過程中，資本集中起來，到了現階段變爲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制度，產生了卡特爾，辛狄加與托辣司等經濟組織，產生了財政巨頭，而同時也產生更嚴重化的經濟危機與更尖銳化的階級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會的民主政治，漸漸已不能做資產階級榨取的工具了，因爲在資產階級方面，一切政權，爲金融巨頭所操縱，有了座談會式的國會，反而不便，而對於勞動大眾，從前用來阻止勞動運動的『社會改良政策』，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的代表，已漸漸走進國會，運用着資產階級本有的民主政治工具，作爲武器而作劇烈的鬥爭了。於是資產階級漸漸取消了本有的民主政治的機構，或者授大權給內閣，或總統，或者在內閣之內，再有少數巨頭會議，決定一切行政方針，使國會等於虛設，而更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簡直以法西斯的獨裁，完全取消了民主政治。

因爲法西斯國家內部矛盾加深，不得不繼續對外作劇烈的侵略，於是不断地損害着民主國家的利益，使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暫時也有了反法西斯的趨勢，這種趨勢與勞動大眾的反法西斯反戰的統一戰綫配合着，表面上又暫時稍稍穩定了本有的民主政治的傾向，而在國際上也因爲要對付法西斯集團的侵略，暫時造成了民主國家的聯絡。

(註二)參看列寧國家與革命，一九三八年中文版第一一三頁及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英文版第二三頁。

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民主政治，已成為「秋風團扇」，其所有的命運，也僅是「苟延殘喘」了。

在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沒落的過程中，出現了蘇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對資產階級，是用無產階級的獨裁的姿態表現的，而對於極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則施行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比過去的形式更高一層，而且正在不斷演進着。

當蘇聯革命成功，憲政開始的時候，只有地方蘇維埃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的，而高級蘇維埃，是間接選舉的。直接選舉的方式，是通過職業團體，或半職業的社會團體舉行的，他們用這種方式的目的，是在乎排除游手好閒的殘餘資產階級分子與富農們。但是勞動人員，不管是誰，全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就是外國的工作人員，也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選舉時先開會議討論，根據各團體切身利益與特殊需要，規定了許多議案，交給被選舉的代表，叫他們帶到蘇維埃去提出執行。

新選法施行以後，選舉方式又完全改變了。以前選舉，以職業與半職業的團體為單位，現在以地域為單位了。因為以前還有階級存在，不得不用職業式的團體，來保證無產階級的利益。現在因為殘餘的資產階級已不存在，而社會因之和諧，覺得用職業團體為選舉單位，只能代表職業的利益，而不能代表人民的全部生活。因為除職業外，尚有許多生活問題，要求集體改善解決的。而地域的選舉，可以代表各地生活的全貌了。而且上級的蘇維埃，也由人民直接選舉了。同時集體農莊業已普及，農民程度提高，所以在新憲法中，農民的選舉與工人的選舉已站在同等地位了。

這不過是民主政治的形式，還不能完全表現出蘇聯的民主性。要看出蘇聯的民主性，還得從人民實際生活中去考察。在蘇聯，政府的行政方針，不是由幾個「巨頭」決定的。全是由各地工廠的工人與集體農莊的農民以及地方各團體決定的。譬如偉大的五年計劃，全是各地人民於工作之暇，回到工廠或農莊的俱樂部，大家討論自己的生產問題，

如改良的方法，及生產的估計，在討論中，每人盡力供獻他的意見，去共同設計，同時不時與政府商確，等討論完畢，將計劃送給政府，由政府設計委員會，綜合了各地的計劃，按着全國的情況，而決定這龐大的五年計劃。不獨如此，各地生產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工作過程中與集體討論中，不斷發現着改進的方法，於是再來一個超過政府規定數量的反計劃，以表示他們供獻給政府的突擊能力，而同時也增加着自己的創造力。許多工人們寶貴的發明，就從這種民主過程中產生出來的。

人民對政府有這樣大的興趣與情感，就因為他們已全國團結起來，成爲一個大集體，已理會到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在國家中的地位。我有一次給他們開玩笑說：『這出品又不是你私人的，爲什麼要這樣賣力？』他們很奇怪我爲什麼說這樣不通的話，接着就說：『自然這全不是我個人的，但是國家所有的一切，却全是我們的。』這個『我們』就是他們努力的原動力，是集體精神的表現。只要『我們』前進，這個小我，自然前進了，因爲在『我們』的集體中，已完全充分代表着所有的『小我』。而各個人的思維範圍，也就擴大到國家以及整個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甚至在監獄中的囚犯，都要聯名寫信告訴政府，『願意用盡他們最後一滴血，來保衛使他們重見天日的祖國。』

政府一有法令宣布，或領袖們一有演講，立刻傳達到國內各窮鄉僻壤，各地都開會討論研究，這種開會，完全是自動的，因爲他們覺得政府一切的設施與行動，都與他們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決不能不關痛癢的。他們討論的目的，在乎尋出政府的法令，如何在他們生活中具體表現着，尋出政府的言論，對於他們生活的意義。同時常將他們的意見，告訴給政府，讓政府作參考，這樣養成他們獨立的自動能力。有一次一個 Molotino 鎮上的職員說：『我們爲什麼要請示省政府，這是地方事件，我們難道沒有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沒有處置的能力嗎？』

蘇聯黨員們的工作，並不是統治人民，干涉人民，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落後的民衆，如何自己組織起來，共同解

決自己的問題。在革命成功的初年，所有的蘇維埃的代表，大多數是黨員，後來漸漸有非黨員的代表及許多女子參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大家慶幸蘇聯政黨的失勢，政權的失敗，而蘇聯的黨政當局，也慶幸人民能自己出來參政，證明蘇維埃政權更加穩固。並且覺得還不夠，還不斷鼓勵人民來自動參政。列寧的『每一個廚房女子，必須出來參政』的口號，常常大書而特書地來鼓勵女同胞，要他們多多努力參政。有一次地方選舉，人民把黨員的候選人否決了，而自己動選舉了大家認為足以代表大眾的非黨員來代替。這使黨政當局，稱贊不止，因為這表示人民已有獨立的能力，來選擇自己所需要的人，同時警告全黨黨員說，『倘若黨員不處處為人民福利努力，就會給人民拋棄，就沒有做黨員的資格。』

工人們與政府官吏之間，有一種極密切的聯系方法，就是他們所謂『社會服務工作』。工人們的工作，不專限於他們自己的職業。一個織布女工，在工作之暇，或許自動在托兒所服務，算是她的社會服務工作，或許因為她服務工作成績優良，而衛生處要她去就某種職務，但她或許仍用一部分時間，在布廠中做她原來的工作。一個汽車工人，因為他在工會裏做收會費的社會服務工作，發現理財有方，而被雇到稅局裏做事，但這並不是提高他的地位，也不一定能增加他的收入，因為官吏的薪水與工人們的工資是不相上下的。同時在政府裏服務的官吏，也得利用他閒空的時間，去做社會服務工作，如在夜校教書，或組織民衆，或在工廠協助生產。這種做官而兼做工的現象，並不是因為事多人少而發生的特殊現象，這是要把人民與政府打成一片的肯定政策。倘若工人不參政，就是放棄責任或落後，而不參加民衆工作的政府人員，就是『脫離羣衆』。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日常民主生活的表現。

蘇聯人民的民主生活的實現，是由人民不斷的爭取着才得到的。他們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許多衝突，但他們却能在不斷的爭取過程中，去尋出集體的一致來。斯太林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對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的時候

說：『你們說到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工農們的意見衝突問題。我已說過，意見衝突，依然存在，而且將來還要存在着，因為沒有這一層，就沒有進步。但是目前在工人中的意見衝突，不是推倒蘇維埃制度的問題，而是集中在改進蘇維埃，矯正蘇維埃機關所犯的錯誤，以及最後團結蘇維埃統治的種種實際問題上。』（註三）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各國民主政治是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而開始的，但到資本主義末期的資本壟斷階段，民主政府也隨着取消而以獨裁制度來代替。而社會主義是推倒了資本主義而起來的新制度，在政治上，則由獨裁而進到更高一層的民主政治，這是歷史上正反合的辯證演變。

三 中國民主政治的經驗

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的君主專制社會，根本談不到什麼是民主政治。雖然在戰國時代也有人提出『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的問題（趙威后問齊使），也有人有『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以及『民爲貴，君爲輕』等主張。但這決不是我們現代所討論的民主問題。這實在是原始社會『氏族制度』（Gentile Constitution）的孑遺。（註四）因爲在封建的農村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居民與外界大多是『老死不相往來』的，談不到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政府對於人民，除了『賦與役』以外，就沒有什麼關係了。而人民在農村中，除了有時荒年與反對苛捐重租的暴動以外，用不着政府去干涉。政府對於這種社會的政策，可以拿呂新吾呻吟語治道篇上的話做代表，他說：『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管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這就是自給自足農村社會所反映的政治

（註三）見 A. L. Strong,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 N. Y., 1934, p. 6

（註四）見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State, Chap. III

思想。而人民的組織以家爲中心，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爲原則。而對於政府就覺得『天高皇帝遠』一點沒有關係了。中國詞章家還說『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這都表現人民對政府的不管主義。所以中國以前是沒有民主政治的。

但中也有四千年的歷史，而且老停滯在封建社會中，沒有巨大變遷。凡是農村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全由大家庭的族長房長或家長處置的，而且所發生的問題，也沒有新奇的，而處置的方法，也都有生活經驗中的前例可援。就是在手工業的行會中所發生的問題，大多也是常見的問題，都由行會中德高望重的長者來援用前例解決的。而這種解決方法，也不至於使衆人大失所望，因爲都是照傳統的例子解決的。這種制度是政教合一，尙賢尊師的制度，在停滯的封建社會中，大家也覺得安之若素，沒有什麼不便。

帝國主義侵入以後，中國社會的各方面起了極大的變化，發生了推倒君主專制的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以後，在形式上，一意模仿歐美各國，有國會，有政黨，有的高談護法，有的主張聯邦，大有民主政治的氣象。但是民主的成效怎樣呢？我們知道國會開會第一次選舉總統的時候，就被軍閥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操縱着，到後來這種高舉『人民代表』招牌的議員們，自己也出賣人格，舉行賄選，惟軍閥之命是從，惟金錢之利是圖。中國最大的政黨國民黨也被軍閥橫加摧殘，而封建軍閥又被帝國主義操縱着，造成長期混戰的局面。到世界大戰，歐美帝國主義忙於自相殘殺，給中國資產階級抬頭的機會，造成以民主及科學爲號召的新文化運動。但是大戰以後，中國受着各國帝國主義加緊的侵略，始終離不了半殖民地的狀態，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始終不能實現。

中國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實現，在一方面固然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但一方面也由於封建勢力的束縛，使民衆不能起來，也不知道民主的運用。一位鄉建運動的領袖，根據他在實驗縣做縣長的經驗，發現中國人民完全不懂得民

主這個概念。當他用民主方式與民衆商議的時候，民衆就絮叨不休而且衆議紛紜莫衷一是，但是當他用命令方式去對付他們，他們就能唯命是從，事情也就好辦了。其實民主是要學習的訓練的，沒有學習的機會與經驗，一下子就大講民主，結果自然無法收拾，只好仍舊回到惟縣長之命是從的狀態了。

不獨民衆受着封建勢力的束縛，不懂得民主，就是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學理上固然熟悉民主原則，而在行動上，則反映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性，發揮着個人主義個人風頭主義與派別活動，他們對於民衆沒有信心，不知道從羣衆中去學習，處處以領袖自居，以個人的利益高於集體的利益，用過去家長制的方法，對付羣衆，要別人以『尙賢尊師』的態度對付他，以命令作爲民意，而且自以爲在那裏講民主，在那裏領導民衆。但是目前羣衆所有的問題，不是封建社會中的傳統問題，大多是空前的新問題，必得羣策羣力，才能解決，依着一兩個高高在上的『領袖』的意見與命令，決不能解決的。

一個團體內有幾個這樣的知識份子，或知識份子的團體，就常常不能團結起來。因爲其中只有領袖，沒有羣衆，自然無法團結。同時這種人因爲要擴充個人勢力，提高個人地位，用孟嘗君養食客的方式，來拉羣衆，使羣衆依賴他，變成他的私黨，爲他所利用。同時再鉤心鬥爭與別人爭地位，以手段爲最高目的，完全不顧到團體利益的大前提。別人的坦白的陳詞和公開的意見，倘若於他個人無益，便看作是陷害他的陰謀，擴大派別鬥爭的幻想，而出來橫加阻撓。這種人的辦事，決不能有所成就的。因爲真正的領袖道路，是民主的道路。先有民主的集體，由集體的意志推選出來的領袖，才是真正有羣衆基礎的領袖。

同時，依賴家長式『領袖』的人們，是專對一個人負責任，專接受一個人的命令，他們自己互相沒有關係，沒有組織，他們不過是烏合之羣，沒有獨立性，只要主子一離開他們，他們就無所適從了。在現階段上有許多漢奸，本來在過去

是依附在政客門下的食客。他們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沒有集體的意識，在他們看來，做食客與做漢奸，是一樣為生活而侍奉主子罷了。

所以中國民主不能開展，就因為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所束縛，要開展民主，必得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同時也只能努力開展民主，團結起來，發揮了集體的意志與力量，才能完全打破這種束縛。這就是民主政治在抗戰建國中的重要意義。蔣委員長在第三屆參政會閉幕詞中指示說：

『總理倡導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國的人民如果不能關切自身的幸福，管理他們自己共同的事務，就是說如果人民不能積極參加政治的話，他們就不能造成幸福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最鞏固的政治，一定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之利害為利害，人民的視聽為視聽。總理的民權理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古今中外，理無二致。我們現在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要得到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絕不能專賴兵力，必須動員民衆的精神，組織民衆已發動的精神，以全國的精神意志力量的總和，來做前方將士的後盾，來做後方開發的原動力，所以充實軍力以外，必得動員民力，更必集合民意。』

四 民主的訓練與開展

民主政治的實現，首先得開展民衆組織，而且從民衆組織中，首先要貫徹民主精神。要有廣泛的民主，才能發動民衆，組織民衆。民衆的事務要讓民衆自己辦理，使他們自從現實中去鍛鍊，從行動中去學習。現階段民衆所需要的，不獨是自治之權，而且要學習怎樣自治。民衆不獨需要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且要學習怎樣去自由發表言論。民主的權利，是民衆自己創造學習的。民衆不獨需要有發表集體意志的民意機關，他們先要有創造集體意志的能力，有獨立組織的

能力，所以民主是需要訓練的。要做一個有用的公民，不是在校裏讀了一課公民學就可辦到的，這是在實際生活中去學習如何發展社會意識，如何與團體打成一片。民衆組織，是民主政治的訓練所。

進過學校的兒童們，在學校的團體生活中，已多少有一點團體生活的經驗。而沒有進過學校的工農大眾，民衆組織，就是他們唯一的公民訓練所。在那裏要民衆學習討論，使他們發現各人意見的不同，經驗的不同，興趣的不同，然後再使他們如何把各種的不同，在抗戰建國的大前提之下統一起來，綜合起來成功一個集體的意見經驗與興趣。學生們在學校討論班中自治會中已不自覺地學習了一點這種訓練，而勞苦大眾，只能在民衆組織中去學習。

組織民衆的最後目的，固然是要把這大集體的力量供獻給抗戰建國的使命上。但是同時組織工農大眾的時候，應當注意到如何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滿足他們的切身需要，使他們理會到他們有許多願望，個人決不能達到，只能在集體中達到。使他們的生活，漸漸由單調而變爲豐富，使他們自己感到集體的重要性而願意參加。要將無組織經驗的羣衆，使他們創造共同的集體意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做羣衆工作的人，必需深入羣衆，虛心地與羣衆中學習，與羣衆打成一片，了解他們具體的問題，發揮他們潛在的力量，與他們一同前進。而羣衆的領袖，是要他們自己集體中提拔出來的，這樣的領袖，才能深深了解他們急切要求，而可以盡量的執行羣衆意志。所謂執行羣衆的意志，並不是事無大小，都先得請羣衆討論了付表決後，才去執行，而是執行羣衆所需要的總路綫，能做到這一層的，就是有羣衆基礎的民主的領袖。

有些熱心而不耐煩的人，首先一心想把民衆組織起來，但是因爲『民衆不聽他的話』而灰心，對於『落後』的民衆，表示失望。其實這正是證明他自己不瞭解民衆，沒有能力發動民衆。過去農民運動的領袖澎湃，在他日記中述說當他進行農民組織的時候，在首先三個月中，他是如何遭到失敗，農民一見他如何就敬而遠之。但是他覺得這一關不

過去，一切事情都不能辦。於是在失敗中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學習了新的技巧，終於把農民組織起來，使農民自動的創造了集體的意志，集體的力量，在農民運動史上，造成了偉大的記錄。我們在現階段組織民眾，已有了蘇俄的經驗以及我們過去去民眾領袖的經驗，作為參考，可以給我們許多教訓。

民主的訓練是沒有止境的，它隨着生活發展而發展，隨着生活擴大而擴大，隨着生活提高而提高。新的集體與條件，就有新的民主問題，也就有新的民主訓練。我們組織民眾，是由小的範圍而漸漸擴大，首先由地方着手，然後進展到全國，把整個民族組成一個大集體。抗戰建國綱領中已明白規定『實行以縣為單位』。惟其這樣的進行，才能將每一個國民，每一家，一鄉一地方的利益，融匯到全國與整個民族利益，來發揮全國一致的民族精神。

前面討論到有階級的社會，只能有階級性的民主政治。而目前中國階級的存在，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那末如何能實行包括各階級的民主政治呢？是的，在普通資本主義的國家，上面的原則是準確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利己，永遠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衝突着，而有着不斷的鬥爭，直等到資產階級隨着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消滅為止。但是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正在長期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的時候，便產生了全民必須一致合作對付強敵的條件。在抗戰過程中，我們已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如何在努力供獻他們的力量於抗戰建國上，而最反動的地主們，又如何能在抗戰中能積極起來與民眾一同保衛着祖國。例如我軍在台兒莊將退的時候，附近台兒莊一帶的地主們商議善後辦法，他們覺得不能放棄了地產與軍隊一同退却，於是只好預備淪陷後降敵。但是他們又覺得日後華軍反攻日軍潰退以後，他們將如何洗刷自己，於是決定淪陷以後，只是假投降，一面分頭担任游擊隊的費用，為日後表白心跡的證據。但又恐本村中有真漢奸去向敵人告發，於是大家決定倘若村內發現真漢奸，便立刻消滅他。但鄰村有漢奸又將如何呢？於是結果將附近各村大家團結起來，實行他們為祖國努力的計劃。這證明統治階級在長期抗戰建國的條件之下，實

能與民衆統一着合作的，同時，造成了民主的團結以後，更能鞏固各階層的合作程度。

這種各階層團結起來的民主政治，就不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上而已經討論過，證明這種民主政治已變成『秋風團扇』了。『總理對於民主政治促進與實行，比各國（指英美等民主國）更澈底更切實的民主政治，在民權主義中一則批評天賦民權學說，而主張民權革命的原則，要盡人皆知人民完全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四種直接民權，這是總理後來居上的精神，着眼於高遠的所在。』（蔣委員長參政會第三屆閉會詞）所以中國的民主政治，要高於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目的在乎全國上下運用這民主的政治力量，對外保證抗戰勝利，來爭取國際地位，對內保證建國成功，實行『經濟平等』，以免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轍，並且可以和平地轉入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的地步。正像列寧指出：『民主制從來不會「單獨」起來的，而一定是「總合」的，牠也要影響經濟，助成經濟底改造，同時牠自己又受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的歷史底辯證律』（註五）

論自由

一 什麼是自由

『不自由，毋寧死』是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爭取自由的普遍的口號。美國獨立宣言中的民主政治三大原則，第一條就主張『人民有不可侵犯的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也宣稱『人生而自由，人權應當平等，』並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法國自由元年。』而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也鄭重指出『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的中華民國。』足見自由問題在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都非常重要，我們不能不提出來專門討論。

但是自由的概念，是錯綜複雜的，往往有人爲着自私自利的勾當，而加上冠冕堂皇的自由的名詞，來淆亂聽衆，譬如中國爲民族自由而抗戰，而日寇反而宣言這次侵略戰爭，是解除中國人的壓迫，與建設東亞自由和平『新秩序』的『聖戰』。有些人以卑鄙邪惡的個人主義爲自由主義，有些人以爲一切政府，一切權威，都是免不了的禍害，所以一定要儘量限制它拘束它。還有人以爲自由是無限制的，任何社會的唯一任務，就是努力增進無限止的自由。甚至與論者對於通敵求降的汪精衛，發了嚴正的批評以後，上海某英文報的社論，還說按民主自由的原則，各人有自由發表政



治主張的權利，攻擊他，制裁他，是違背民主自由的原則的。以上這種意見，不是別有用意，就未免曲解自由了。

自由之所以往往被曲解，就因為這本身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大家可以用觀念論做出發點，憑空討論，說得好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來有意無意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們要瞭解自由問題，非從社會上具體的環境中去研究不可。個人思想與行動的自由，與他的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有很密切的聯系。人們在某種經濟政治的關係中，就有某方面與某種程度的自由。離開了社會的實際環境，就不能講懸空的自由。譬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與財產制度是分不開的。所有的生產工具，包括生產與論的工具如報紙，無線電與電影，以及教育制度，全為資本家所控制，而思想的自由發表，又非通過這種工具不可。勞動大眾，不能自由運用這種發表的工具，而說還有言論自由權，未免是自欺欺人之辭。因為在龐大的社會裏，沒有這種發表的工具，個人的言論，不能使別人聽到的。

在勞苦大眾的生活方面說，他們除了勞動力以外，便一無所有，他們必須為資本家工作，而且任意被剝削，工作的時間與報酬，以及工作的環境，全由資本家決定的，而且因為有許多失業的工人們在廠外等着要求工作，逼得他們不得不聽從資本家的條件而努力工作，以求維持職業。所得的進款尚不能溫飽，那裏還有金錢與時間，去自由享受教育與娛樂。一有經濟危機就要受到減工資與失業的威脅。這種生活，與資本家的任意揮霍，到處享樂的情形，誰有自由，誰沒有自由，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經濟的限制，在其他生活方面的自由，也隨着受影響。譬如從前中國富翁，可以有三妻四妾，窮人就無錢結婚，現在在法律上雖然不准納妾，但可用離婚再娶的方式來補償。在美國因為離婚手續費太貴，使普通勞苦大眾，無錢正式離婚，於是『遺棄』變成美國窮人離婚的唯一辦法了。至於女子因為沒有經濟地位，大多數不得不以結婚為職業，終身依靠丈夫，在廚房裏做一世的奴隸，很少有離婚的自由。中國以前女子不獨不能要求離婚，而且夫死不能再嫁，要

『從一而終』的美德的。

在法律上窮人的訴訟，因為無錢請律師辯護，只好任人支配，而富人則可請許多大律師爲他設法避免法律上的責任。窮人往往爲生計所迫，不得不挺身走險，犯法入獄，而有權有錢的人，決不會做小偷的，他們犯的是賂賄與搜刮的大罪惡，但因為地位關係，法律不能制裁他們，所以蕭伯納說：『小偷得進監獄，大盜却入國會』，這和中國所謂『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一樣是精闢之語。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因爲生產工具是公有的，取銷了人對人的剝削制度，人們不能再靠着財產來施行特權，而自由的範圍也隨着變更。勞動大眾都可以享受各種自由，他們有合理化的進款，有餘暇的時間來受教育及其他文化的享樂，他們不獨有言論自由，而且可以自由運用無線電台，印刷所，電影，使他們的意見可以傳達達全國。生病了，國家有醫生免費醫治，老了有養老金，不論那種工人，每年都有假期，可以自由旅行與休息。中國人的『積穀防饑，養子防老』的名言，他們覺得毫無意義了。儲蓄對於歐美與中國人是美德，因爲這可使他有備無患，以防不測，但在蘇聯，變成小資產階級的惡習了。因爲只有在蘇聯，各人可以今天有錢今天自由享受，所有個人的『不測』與『患難』，都有國家代他們担当着，自己不必顧慮。女子們大多已脫離了廚房的奴隸生活，出來參加生產，參加國事，處處與男子絕對平等。因爲生育與生理上的不便，國家又給以特別保護，使她們在工作方面，享樂方面，沒有一處不與男子一樣自由。德國作家雷翁·傅克脫惠格（Lion Feuchtwanger）說：『這種對於自由的概念，現在已變成蘇聯公民的一種真理。那種存在在一般所謂民主國家裏的，能够對於政府提出些無關緊要的抗議的自由，雖然也許好的，但在蘇聯的人民看來，無疑的，沒有了失業，沒有了老年時代的貧苦，以及沒有了對於未來子女担心的自由，是更來得好些。』（註二）在蘇聯社會

的人民，所以有更大的自由，就因為他們有社會主義的基礎。所以斯太林特別指出『只有等到剝削的制度消滅掉，沒有了人壓迫人的存在，沒有失業與貧窮，每人不致有失掉工作，家庭與食物的恐慌，到了那種境地，才有真正的自由。』

(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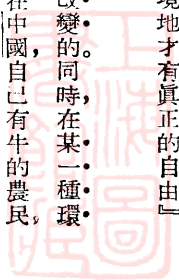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自由的概念是相對的，不是絕對，因為自由的程度是隨着環境改變的。同時，在某一種環境中，對於某種行動，以為是自由了，而同樣的行動，在另一環境裏，便覺得是自由的障礙。譬如在中國，自己有牛的農民，比起沒有牛的農民，在生產方面自由得多了，而且收穫可以增加，在生活方面是一個很大的保障。就是在蘇聯集體農莊開始的時候，也以『將來每人可以自己有一頭牛』來表示集體農莊生活的富裕，號召農民加入。但到現在情形不同了，作者在一九三五年親自看到的集體農莊的農民，不要牛了，他們的理由是『自己養牛太麻煩，太不自由』。他們說：『以前因為我們生活沒有保障，自養着牛，在耕種方面，與牛乳的供給，就有很大的幫助，現在集體農莊的出產，已很富裕，我們的生活已有保障，我們做工以後，要洗了手到集體農莊的圖書館，公園或體育場去享受文化生活了，誰願意回家以後，再去費工夫侍候牛呢？同時集體農場中有養牛的專家，比我們自己養得高明多了，所以我們將國家給我們的牛，全交給農場養了，自己可以自由些。』

二 個人的自由從集體中獲得的

有的人以為集體生活，是消滅個人自由的，因為要有自由行動，所以不得不離開集體生活。但是實際上正是相反。

(註二) 斯太林與外國新聞記者 Mr. Roy Howard 談話引自 John Strache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Radium House, N. Y., 1936 p. 210



在集體生活中，個人才能得到自由，離開了集體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因為我們的意見與行動，要通過了別人，才能有美滿的迅速的實現，不然就沒法表現了。拿漂流在孤島的魯濱遜來說罷，他的自由，是受着極大的限制的，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因為每日的生活問題，逼他非自己種地自己做一切為個人生活上所必需的工作不可，雖然他是文明水準很高的社會裏來的，但他的工作的成績，與野蠻的土人，沒有多少分別。因為『衆擎易舉，』『獨木難支大廈，』獨自要做各方面的的工作，決不能實現他所理想的成績。

倘若社會上有許多人，各人都不願別人而自己要自由行動，結果必互相牽制着，阻礙着，抵銷着，弄得一事無成。只有將個人的意見，個人的行動，寓在集體的合作生活中，才能更自由地表現着，更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在有組織的集體中，各人可以依類別人，共同協助着，來努力他們所要實行的公共計劃，比個人施行起來，要容易得多。譬如工人們受資本家剝削，起來要求改善生活，他們雖各有要求的自由，但倘若各人個別要求，資本家即可個別處置以開除和恐嚇，使各個人不得不唯資本家之命是聽，倘若有人再要抗議，則無疑地是被開除了事。而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希望，就是可以『分而治之。』但是集體要求，就有極大的力量，有罷工的武器而各人的個別要求，在集體行動中，就可更自由地達到目的。

又如農民的生產，自耕農在一小塊土地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因為他不能用機器，請不起專家指導，對於生產有各種限制，決不能自由達到很高的目的。但是蘇聯的集體農莊，是將許多自耕農組織起來，共同合作生產，有機器代替人工，有專家指導改良，不獨生產量遠超過自耕農的成績，不獨物產品質較以前優良，而農民本身因為分工合作，可以各有專門，不多幾年，自己變成了畜牧，種子，土壤等等專門家了。因為他們有機會可以做各種試驗來改進生產，可以學習解決農業上各種問題，同時農村生活也慢慢地達到城市生活的水準，他們不獨有公園，學校，圖書館，無線電，報紙，並

且有許多以前不識字的男女農民，現在能到莫斯科參加各種全國會議與國家事務，這種機會，以前連夢想也不敢夢想的，而現在都已見諸實行了。機會的增加，也就是自由範圍的擴大。

舊的自由觀念，僅在於解除限制，而現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給人民的自由，不獨是限制的解除，而且是新機會的創造。因為蘇聯沒有了階級的分別，更沒有資本家互相勾心鬥角的競爭，國內全體民眾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大集體，而人民在這大集體的生活，就有許多以前意料不到的機會與自由。例如一個在蘇聯工作多年的美國工程師對人家說：『以前我在美國不過是一個汽車工廠的工程師，那時候的工作範圍，只限於一廠的活動，現在我在蘇聯，所有的改良方案已被全國各汽車工廠採用，而我被派為全國汽車工廠的顧問了。這種自由在別國是斷乎得不到的。』其實在蘇聯，不管是誰，只要工作最優秀，就有做全國顧問的機會，有一個鄉下擠牛奶的女孩子，忽然一舉成名，受到國家榮譽獎章，因為她擠牛奶最成功，她的方法立刻通行到全國，而全國各地都去信請教她。斯泰哈諾夫的運動，也就是其中更為顯著的例子。所以斯太林在一九三六年接見的時候說：『我們建設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以使各人的個性能真正自由，我們建設它，為的是真正的個人自由。』(註三)

人民所以擁護國家，因為國家是現在人類最大的集體，它能給國民一切所需要的機會與自由，否則人民即要起來革命，從新組織合乎人民需要的國家。倘若國家被人侵略而失却自由，國民除了做亡國奴外，根本就談不到什麼是自由，一切受人限制，正如『覆巢之下無完卵』，誰都不能逃出這亡國不自由的範圍。至於漢奸們做到登峯超極的大傀儡，誰都知道不過是一個奴隸總管，處處奴顏婢膝，仰人鼻息，他們的地位，以執行主子的意志遇到與否而決定，他們不獨出賣民族，同時也整個兒出賣自己。倘若民族被壓迫被滅亡，而人民還能有同樣的自由，誰都不會犧牲了一切去

抵抗了。正因為先有民族的自由，然後才能有個人的自由，所以才大家要齊心合力去奮鬥，像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指出說，「今日致力於抗戰乃爲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而中國在抗戰中所以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其重要特點也在乎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偉大的集體。人民在大集體中，更能發揮抗戰的自由，不像阿比西尼亞受意大利壓迫後，無法繼續抵抗，因爲大國人衆地廣，資源豐富，人民聯合以後力量的偉大與持久，不是小國所能辦得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過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使中國停留在「一盤散沙」的狀態中，使中國分爲幾個小部分，可以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因爲國家分裂，人民就不能聯合在一起去自由發揮抵抗的力量了。即使抵抗，也變成幾個阿比西尼亞而相繼被併吞罷了。

但是個人在集體中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因爲在集體生活中，應當顧到全體的利益，大家互相配合着，才能共同團結合作。英國名作家韋勃夫婦指出：

「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只有一部分的機會，開放給集體中的人們。無論何人倘若他越出了他自己分內應得的機會以外，不獨搶奪了別人應當享受的一部分的機會，並且發生了不平等，而顯然要減少在團體中各個人的總自由。倘若社會團體，使英國輪船公司的主人與其家族，有一個旅行於瑞士與意國的長而靡費的假期，而幾百個碼頭上卸貨的工人們與他們的家屬，所得到的只有強逼的失業的無工資的假期，這樣不獨損害了後者，而且減少了集體的自由。聽說列寧有一次曾經注意到而諷刺地說：「是的，自由是寶貴的，因爲如此寶貴，所以一定要有限制。」」（註四）

集體倘若不將機會在各個人方面平均分配，便要發生矛盾，而團結就因之發生問題。團體中磨擦衝突，鬥爭等最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機會與自由的分配問題。但在和諧的集體中，各個人仍不能完全自由，仍要以大局為前題，限制着各個人的行動，使他不出本分的範圍。各個人所以能遵守自由的限制，不是因為各個人願意在集體中犧牲自由，乃是因為他知道倘若他尊重集體的意志而犧牲一部分的自由，在另一方面，集體可以給他更大的自由的保障，所以才肯犧牲。譬如，在抗戰階段上，各階層各團體的人們為着整個民族的利益，不得限制一點自己的部分的利益，來服從抗戰，因為抗戰成功了，它們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且有獨立自由的國家給它們保障。這種為集體而限制個人一部分的自由，好像人們拿出一部分進款，付保險費一樣，目前雖然犧牲了一部分的進款，但日後的生活，更有保障了。

為使集體團結而相當限制各個人的自由，不得不用集體的紀律去規定各個人的自由範圍，去制裁越出範圍的個人。紀律越嚴明，集體越能團結，各個人在集體生活中的機會與自由，也越有保障。倘若個人不服從集體，少數不服從多數，全體不服從幹部的領導，則組織必趨鬆懈，集體生活便無法進行了。集體生活，好像一個音樂合奏，需要各種不同的樂器配合着，再加上領袖的領導，方能合奏和諧的曲子。每一個不同的曲子，便需要各種樂器來不同的安排；韻律的改變，需要全套樂器的和諧的集體的配合。因為要保守和諧與一致，所以不得不將不適應的聲調除去，否則就不成曲子了。集體的紀律，就是要除掉這不合拍的聲調。

至於幹部領導的失策，或者對於個人的自由，有許多不必要的干涉，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民主。所謂民主，並不是每一件事，都得全體討論全體表決了才能執行。特別是國家大事，決不能如此辦法。最要緊的是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來決定國家整個為人民謀福利的綱領，或者由政府來制就綱領而得到民衆的同意，則政府就不是與民衆對立的團體，它是執行民衆意志的幹部，是為民衆服務的領導機構。它的一切行動，只要本着綱領的路線，就是集體一致要求的路線。等到社會產生了新的情形，然後再決定新的路線。這樣不斷地努力為羣衆謀幸福，可以使羣衆了解只有集體

的行動，可以使各個人得到幸福，而鐵的紀律，決不是爲着幹部的利益，也決不是爲着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爲着集體的利益，而執行的紀律越嚴明，同時生活制度越民主化，則各個人在集體中，越能發展積極性，越能團結在幹部領導之下，發揮集體的力量，去執行集體的意志。

紀律與民主決不是對立的，而且反是相成的，越民主化越可有紀律，沒有民主而有紀律，不是集體的紀律。民衆不肯爲這種紀律奴役的結果，只有反抗與分化。倘若是民主的紀律，那便是集體自己的意志，越可制裁個人，越可團結。因爲制裁少數違反集體意志的人，就是對於全體民衆的自由保障。

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關頭，越需要團結着去發揮集體力量的時候，越要求集體的鐵的紀律。在抗戰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能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公開自作主張，因爲這種違反國策的公開主張，不獨表示他個人的叛變，而且是分化集體的抗戰力量，危害着整個民族的生命自由。國家理應迅速地給以嚴厲的制裁，而制裁的結果，反過來又可加強民族團結。倘若汪精衛在決定國策時候，提出和平的意見與理由，要求大家討論，這是可以的，而且大家當給以相當考慮，研究他的主張對民族是否有利，這是民主的步驟。但是抗戰國策早已決定，而又得到全國人民一致熱烈的擁護，並且大家正犧牲一切而支持着這持久戰，在這時候，誰都沒有權利在作反集體的主張，更不應以公開方式來號召，何況又是身居黨政要務的領袖，更何況是通敵求降的漢奸主張。爲鞏固集體利益計，只有用鐵的紀律，來消滅破壞集體分子，來保證集體的自由。

三 自由是奮鬥得來的

一個民族的自由，或一個人的自由，都是自己奮鬥得來的，不是別人賜與的。歷史上每一個民族每一個階級，在得

到它的自由以前，都經過一番激烈的奮鬥。在法西斯蒂帝國主義集團侵略弱小民族的現階段上，爲民族自由而奮鬥，是具有特殊意義與使命的。我們知道全地球上二十萬萬人口中就有十二萬萬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六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而帝國主義的宗主國人口却只有三萬萬四十三萬人（占全球人口萬分之十七）。這就是說，在宗主國壓迫民族內，平均每一個人就有四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奴隸。同時世界上法西斯半法西斯及其他專權的國家，有三萬萬一千三百萬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五·四）（註五）在法西斯集體中，有日德意爲軸心，皆以戰爭侵略爲手段，並且這軸心又日漸擴大，侵略又日益瘋狂。我們的民族抗戰，不獨爲中華民族的自由而戰爭，同時也爲削弱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侵略，爲增加全世界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力量，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同時也是協助日本被軍事法西斯控制下的民衆，爲他們爭取自由。這種抗戰是革命的，正義的，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一戰爭失敗則不獨我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失却自由，同時加強了法西斯的氣燄，對於其他民主國家與被壓迫民族，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爲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與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是分不開的。

對於中華民族本身，只有這次抗戰勝利，才能把中國半獨立的國家變爲獨立自由的國家；把被壓迫的民族，變爲獨立的自由的民族。所以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指出：『抗戰之目的在求民族之生存獨立，必須民族爭回生存獨立，然後此民族所立之國家始有和平之望。』所謂獨立，平等，自由，都是分不開的。而爭取的方法，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努力團結一致和奮鬥。

（註五）參 Rado, Atlas of Today and Tomorrow, London, 1938, p. 196. 及徐懋庸何幹之等著社會科學基礎教程。

但是奮鬥是要求犧牲的，只有全體人民團結起來，願意犧牲一切，去爭取民族自由，最後勝利才是我們的。十九世紀中頁爲意大利爭取民族自由的領袖瑪志尼說：

「人人從全體的福利裏追求他自己的福利，認全體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全體的利益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人人總是情願爲這個公共家庭的全體犧牲他自己，並且其餘的人也同樣情願爲這一個人犧牲他們自己。到了這個時候，現在壓迫人類的那些禍害，大多數都消滅了，像天邊的濃烟到太陽出來就消滅了一樣。」（註六）但是這種自動的犧牲，與被動的奴隸式的犧牲，完全不同。後者是無報酬地被剝削，而且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而前者是自己願意參加的，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各人參加犧牲的時候，已預先看到犧牲的結果——民族的獨立平等與自由。他不是以犧牲爲目的，他是以犧牲爲爭取民族自由的應有的義務，他與民族抗戰勝利，民族自由解放，打成一片，他是自動地自由地參加的。他不以此爲不可避免的條件，他是歡迎這種可能性當作他的願望。同時也只有他與集體打成一片的時候，才能有這種忠勇的奮鬥，才能使他的犧牲成爲集體與個人的無上的光榮，神聖的任務。

自由是非常寶貴的，只有光明的正大奮鬥，才能爭取得到，用妥協的方式去求自由，其結果只有斷送自由。我們知道捷克的自由，是怎樣被英法用妥協的方式斷送掉的，使德國法西斯蒂兵不血刃，而併吞大塊領土，並且使捷克全國，不得不受它的控制。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領袖們，在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時候，只圖與法西斯妥協，不爲德國勞動大眾的自由而奮鬥。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們在國會中演說，極力擁護法西斯政權。因爲第二國際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殘暴，他們提出抗議，並且退出第二國際，以表示對法西斯的忠誠。到五月一日勞動節的時候，他們努力領導工人們參加，但是工人們已拒絕了他們的領導，而法西斯蒂發現他們已經不能在工人方面起作用，即不再利用

（註六）瑪志尼，人的義務，商務印書館（中文版）第一〇六頁

他們了，五月二日他們就被捕下獄，而法西斯工運負責者宣布說，他們『或許自認忠於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在監獄裏比較好一點。』他們或許自己也想不到這樣委屈求全，與法西斯政府妥協的結果，不獨出賣了勞動大眾的自由，而且也斷送了自己的自由。（註七）

爭取自由，雖不能妥協，但也不能好高務遠，不切實際。最顯著的是有些青年，被托派的階級高於一切『左』的論調所迷惑，以為這是最徹底的為無產階級爭取自由的信條，而不瞭解被日本壓迫的大集體，是整個民族，不瞭解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的指示，他說：『被壓迫民族底每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反對壓迫的，那普通民主主義的內容；正是這一個內容，我們（無產階級）無條件地贊成。』（註八）這些青年在現階段上，民族解放的階段上，仍標榜着階級利益，階級自由高於一切，他們既要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又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結果，便分化了民族大集體的陣線，被敵人所利用，有意無意地執行了漢奸的任務，出賣了民族自由與階級自由。

所以用妥協與急進的方式，爭取自由，結果反而失却自由。最大的原因，在乎對於現實沒有準確的瞭解。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準確理論的行動，就是盲動。所謂準確的理論，就是對具體現實各種關係的準確的瞭解。我們用自然科學，瞭解了自然界，就可不受自然界的控制，就可按着自然界的規律來運用它。例如原始人對於閃電是驚懼的，而我們瞭解了電的規律與作用，就可自由運動，為我們服務了。一個醫生或一個工程師的一切行動與思維的自由程度，是根據他對於問題瞭解的程度而定的。對於社會也是如此，唯其能準確瞭解現實的社會

（註九）參 R. P. 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Martin Lawrence, London, 1935 p. 129;

and John Strachey, *What are we to do*, Victor Gollancz, London, 1938 pp. 177—8

（註八）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三七〇頁。

變遷的狀況，才可得準確的社會變遷的法則，可以預先料到各種變遷的結果，可以估量如何利用優勢，如何免除劣勢，來達到所希望的目的。能理會到各種必須的條件而運用它們，就有了自由。我們不是以現在的一切來控制將來的結果，我們以估計將來的一切可能性，來充實與調整現在的行動。能够這樣熟慮與審察，我們的行動，就有了自由，就有了成效。這與下棋相彷彿，棋國手是懂得棋子各種步驟的變化，他預料着最近將來的各種可能性，來決定他的行動。步驟不會下棋的不是亂走盲動，就是『舉棋不定』，誰有行動的自由，誰可操勝算，就要看誰能瞭解局勢與運用得法來決定了。

現階段民衆爲民族自由而奮鬥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組織起來，變成一個有團結的集體。各地民衆，按着切身的利益與特殊的需要，大家自動組織，然後統一着聯合着，造成了各黨派統一戰線的基礎，而羣衆有了組織，才可開始負起這爭取民族自由的偉大的使命，而各個人也才能在集體中自由發揮他的奮鬥的力量。同時各階層各集團的民衆在全民族的大集體中，仍須保持自己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與組織上的相對的獨立性。這樣一面可以滿足各階層各團體本身的特殊需要，一面來服從民族的統一性，使各團體在民族整個大機構中，各自站在民族抗戰的崗位上，盡量自由發揮崗位上的功用，與整個民族在行動上配合着，變成有機的抗戰總力量。組織沒有獨立性是違反民主的，不能發展各階層各團體本有的力量，倘若獨立性不服從統一性，則力量不能集中。只有民主集中制，才可一面充分保持各階層各團體的自己利益，以免過於被侵軋而失却自由；一面變成全民族分不開的一個機構，去適合團結抗敵的總要求。

四 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過程中民衆應有的自由

此次民族解放戰爭，是長期的鬥爭，同時要在抗戰的過程中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和國，以充實抗戰力量，使抗戰建國，兩相輔助，以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民衆本着這個大前提，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他們得運用所有的一切人力物力與知識，纔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同時還要不斷的自力更生，去產生各種新的力量。這種力量的發揮與產生，應該是自由的，應該受政府保護援助的。沒有自由，就不能履行他們的隨便那一種義務。因為國家是爲人民而存在的，人民不是爲國家而存在的。倘若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民衆決不會踴躍參加的。因爲民衆在現階段上有享受自由的權利，並且假如有任何阻力，妨害民衆的自由，剝奪民衆的自由，民衆就有努力爲自由爭取自由的義務。

但現階段民衆要求的自由，並不是極無限制的絕對的自由。民衆所要求的自由，是按着具體環境所允許的各種必不可少的自由。現在中國正在擺脫半殖民地的封建殘餘，同時中國也沒有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民衆應有的自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國民應該享受的自由。現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進步的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所要求的各種自由，只要運用得法，是與全體民衆可以共同享受的，而且必須與全民族共同享受的，因爲新興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正在負着時代付與的使命向前邁進，它的興趣，常常大致與全體民衆的興趣符合的。

自從全面抗戰以來，全國民衆，已漸漸團結在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綱領之下，來盡民衆應有的責任。但是政府直到現在，還沒有使民衆得到充分的自由。這是民衆在抗戰建國階段上，所受到的很大的阻礙，同時也阻礙了抗戰建國順利的進行。過去對於民衆自由種種不合理的箝制，應當從速解除。而且戰事已進入第二階段，政府更需要民衆的支持，爲了擴大人力物力與知識的動員，民衆的自由，有進一層的迫切要求，同時也是提高政治效力的基本條件。

民衆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向政府要求的自由，大致可分爲政治的自由，思想教育的自由與經濟的自由。而這三方面，又互相配合着的，我們爲討論方便起見，不得不分別說明。

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早有明文，規定人民於不違反三民主義之最高原則有言論出版集合結社之自由。但在實行方面，至今始終沒有貫徹，內地各處仍有封建勢力壟斷着一切，使民衆不能發表抗戰的言論，有的純粹抗戰刊物，橫被禁止與沒收，使許多人民至今還不明白抗戰的意義，而民衆的集會結社還不能積極推進，使各地不能盡量動員，不能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出知識的地步，甚至有些土劣地主們，自己有錢不出錢，反而強迫窮苦大眾，既須出力又要出錢。抽調壯丁，本是人民應有的義務，因爲民衆不能組織，民運不能開展，使抽調壯丁，還等於拉夫。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不免除，抗戰建國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充分發揮的，倘若人民能充分運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一面宣傳一面組織，民衆同時可以用組織的力量來爭取機會平等，不使土劣地主們，再有無理剝奪窮苦大眾自由的機會，而抗戰建國的能力也可大大地提高。同時使民衆有着直接政治的訓練，爲日後加入真正民主參政機關的準備，倘若民衆沒有政治訓練，不會有真正民主的參政機關的。

在思想教育方面，民衆所要求的自由，也是非常迫切的。因爲大多數民衆，自從民國以來，仍有着封建式的意識形態，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懂得什麼叫自由，也不會來爭取自由，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政治經濟的落後性，反而濫用自由，發揮着個人主義，個人風頭主義，派別的活動，以及個人利益高於民族利益的惡劣傾向，這種情形，是不利於抗戰建國的。怎樣普及抗戰教育，怎樣努力思想的鬥爭，來剷除種種惡劣根源，應當給民衆以努力於思想教育的自由。民衆有了思想教育的自由，則民族意識可以一面普及一面提高，使各個人都有審察力，創造力，選擇力，以及對於環境的應付能力。這都是自由國家的民衆所不可少的自由能力，也是抗戰建國的決定因素。

中國民衆的最迫切的自由，是吃飯自由。他們一面受到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和封建勢力的剝削，終歲勤勞，不得一

飽而一面感到失業與災荒的威脅無法謀生因而死亡的每年不知有多少這是國家很大的損失，人民很大的痛苦。政府應當積極改良民衆生活，積極發展國防經濟，來啓發廣大羣衆的抗戰熱忱與生產熱忱，藉以支持長期抗戰。同時保證民衆的思想教育，言論，遊戲等各種自由，不是一紙命令一條法律所能奏效的，主要的是先有吃飯的自由，然後才有餘力去發展其他各種自由的機會。

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當努力於大衆的經濟自由，對於少數資本家與大地主的發展，應當給以限制，以免抗戰勝利以後，國家經濟權，僅操在少數人手中，使他們有謀自己特權的機會，重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而大多工農羣衆，仍被壓迫而得不到自由。民主主義的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原則，當具體地切實運用，保證大多數民衆有經濟自由。總之，現階段民衆所要求的自由，是民主國家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思想教育自由與經濟自由。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說得很明白：『祇有給予人民以自由，使人民與國家在實際生活上打成一片，纔有真正的統一。』因爲『政治之自由，爲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經濟之自由，爲吾民族生存之憑藉，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享之。』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只有切實努力實行對民衆的諾言，才能使民衆積極發揮偉大的力量，協助政府，共同建立自由的中華民族。

民衆運動論

吳大琨

民衆運動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經是差不多爲每一個支持抗戰的人所接受了，但關於民衆運動的本質，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以及當前中國民衆運動所應走的途徑，這些問題却未必爲每一個今天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所大家一致討論過，同意過。在這抗戰走上新階段，中國的民衆運動又須有廣大的新的展開的今天，無疑地，關於民衆運動的這些基本問題，在從事民衆運動者之間，以及在廣大的羣衆之間，都是都應當有一個一致的認識的。下邊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問題的一些瞭解：

一 民衆運動的本質

什麼是民衆運動？它與政黨運動有些什麼不同？這問題是我們所必須首先要解答的。

民衆運動是民衆（對政府而言）爲了要完成當時民衆的共同要求而所發生的一種帶羣衆性的（即不是少數人的）組織活動。

因此，民衆運動，在它的本質上說，是非常廣泛的。只要是人民所組織的團體，它在爲某種目標而活動着，我們都應當把它看作是民衆運動中的一部份。

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因為政黨運動雖然也有組織，也是爲了要完成某些羣衆的要求而從事的一種運動，但第一，政黨的目標是集中在政治，以取得政權爲目標的，而民衆運動則不然，民衆運動與政治上的活動雖然不可分（而且必然也是應當與正確的政黨活動合流的），但民衆運動除了政治上的要求之外，還有其他的各種要求。民衆運動者只想推進政治的改革，但他本身並不想就此爭取政權。（一部份民衆運動者後來進入政治生活那是私人問題）民衆運動者除了一般的政治工作之外，他還有人民自身的各種組織工作，教育工作，生活福利工作要做；而所有這些工作，也都並不是單純的政黨活動所能解決的。這可說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的第一點。

其次，民衆運動，因爲它的性質上的廣泛，所以參加民衆運動的人也就必然可以非常衆多。差不多只要是人民，那麼，我們在理想上，是都應當把他吸收進民衆運動中間去的。而這一點與政黨運動就又是不同的。政黨——我們知道是由代表着社會中某一階級利益的人，同時是對政治絕對有興趣的人所爲了要達到他們的目的而組織的。因此參加政黨的條件，當然，必須要相當的嚴。任何政黨不能使全體人民都成爲黨員，但民衆運動者却是可以而且必須使全體人民都成爲民衆運動參加者的。這可說是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的第二點。

不過，民衆運動既然是民衆爲了要完成當時民衆的共同要求而所發生的一種帶羣衆性的組織活動，因此當然，民衆運動一定也是有它的時代性與階級性的。

在封建時代，或封建時代以前，人民還不會有自覺的時候，不用說，真正的所謂民衆運動是不可能有的。民衆運動的產生，嚴格地說來，應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後，因爲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後，所謂人民中間的有力份子（如工、商、農、界人士以及文化智識份子）才可能在社會上佔到地位，同時也才可能有權起來與問政治，在這以前，人民即使受到了無窮的壓迫，至多只能有暴動，有某種限度內的祕密結社（這些都是民衆運動的畸形形態）

但經常的民衆組織活動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們說，嚴格地說來，民衆運動應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而後有的。

民衆運動的產生，果然有着所謂時代的限制，而民衆運動的內容，自然更是有着時代的限制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或封建統治尚未被推翻的時代，那時民衆的共同要求，（即民衆運動的目標，）當然一定會集中在脫離一封建統治的這一點上，而在這時候，資產階級的人士也一定會是參加民衆運動最踴躍者。到資本主義後期，那時民衆運動的目標，就由於環境的改變，必然會漸漸地傾向於使資本主義否定的道路上去，而民衆運動的踴躍參加者，這時也就轉向到職工階級這一方面去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以及參加民衆運動人士的階級成份不同，各時代的民衆運動的性質，因此也就會不同。但不論民衆運動的性質如何不同，有一點，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一時代的民衆運動必然配合了社會的改革方向發展的。民衆運動決不可能離社會環境而獨立，而是正相反，被決定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的。

二 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

明白了民衆運動的本質，再來談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那就比較容易了。

前邊已經說過，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但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却是極密切的。

民衆運動開展的結果，民衆爲了要能貫徹它們的要求，必然會對最能代表多數民衆利益的政黨表示擁護，同樣，政黨爲了要能取得民衆的擁護起見，也必然會對民衆運動的開展給予最大的幫助。民衆運動而如果不能與正確的政黨運動配合，那麼這民衆運動就將不能在政治上發生作用，同樣，政黨運動而如果不能與民衆運動取得配合，那麼

這政黨運動也將失去了它的生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從民衆運動以及政黨運動的歷史發展上看，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歷史上有很多的政黨，往往是在民衆運動的發展中形成的，同樣，也有很多很多的民衆運動是在政黨的鼓勵下產生的。但不論政黨運動與民衆運動，二者之間有多少密切的關係，這二者之間在性質上的不同，却還是存在的。

現在一般人的誤解，往往就是因為將民衆運動看成了與政黨運動完全相同的東西。因此在從事民衆運動的時候，就使得民衆運動的作風有些類似政黨運動化；同時，甚至因此還有人認為，在今天只要從事政黨運動就夠了，民衆運動的一切好像都是應當服從政黨運動的決定的似的。我們不能不認為，抱着這種見解的人，他對於民衆運動的認識是錯誤了。

但與這同時，另外也還有一些民衆運動者，他將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看成太互相對立的東西了。彷彿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就絕對不應與政黨發生關係，而政黨中間的份子就更絕對不應來參與民衆運動。對於這種將民衆運動看成完全是「超然」一切東西的意見，我們也不能不認為是錯了。

事實上，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是可以沒有對立的，而且也是應當沒有對立的。

民衆運動，有民衆運動的特殊性，也可說是獨立性，因此，無論誰在從事民衆運動的時候，（即使他是一個政黨的黨員）我們都應當要求他尊重民衆運動的這一種獨立性。把民衆運動而企圖作成某一黨，某一派的「私產」，這是不可能的。但民衆運動也並不是沒有政治性的。如果某一黨，某一派，他能在實際上幫助民衆運動的發展，或者代表民衆的利益，那麼民衆運動的發展結果，也當然會是對於這一黨，某一派表示擁護的。

在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內，政黨與政黨之間應當有一種合法的競爭，但誰是這些政黨的最後裁判者呢？就是民衆，而且是有組織的民衆。所以民衆運動的發展，在這一意義上說來，我們正應當承認它是政黨政治發展

的。前提沒有充分的民衆運動的發展，是也決不可能有充分的政黨運動發展的可能。

三 中國當前民衆運動的動向

現在要說到我們當前中國民衆運動應有的動向了。

中國過去的民衆運動且不談，自「九一八」以後，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示威運動以後的民衆運動，我想是誰都應當承認中國的民衆運動，是集中在「救亡」這一目標下的。而且，我想這七八年來，民衆運動所在中國政治上起的作用——抗戰，以及國內團結的終於實現——是應當算是中國民衆運動力量的偉大表現的。

但也正因爲當前中國民衆運動的目標，是集中在「救亡」這一目標下，所以中國當前的民衆運動就有了一個特徵，它表示了統一戰綫的特徵。在歷史上，各國各時代的民衆運動總多少帶有與統治階層對立的意味，但在中國當前，因爲主要的目標，只是「救亡」，所以不但不與統治階層有什麼對立的關係，而且正相反，民衆運動是應當爭取與統治階層完全合作的前途的。

中國當前的民衆運動，必須強調統一戰綫，因爲統一戰綫可說就是現階段民衆運動的目標，統一戰綫有幾方面：就政府與民衆的關係說，民衆應當與政府合作，政府也應當與民衆合作。在今天，如果還有人從事民衆運動而對政府採取對立的態度，那當然是錯的，可是在今天，如果政府中間的人還認爲民衆運動的開展是對政府不利的，那也就是錯誤的。民衆運動的與不與當時的統治階層對立，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問題，如果客觀的事實需要對立，那麼即使提倡「統一」也還是會「對立」起來的。當前中國的環境既需要「統一」中國的民衆運動當然是會向與政府「統一」的路上發展的。



至於就民衆運動與政黨的關係說，那麼，前邊已經講過，本來就是不衝突的，當然更要爭取「統一」了。不過，抗戰到今天，有一件事實表現得非常嚴重的，那就是不論大家對民衆運動的重要性，已經有多少認識，可是中國目前的民衆運動，無論就它的數量上說，或者是質量上說，還都發展得太不夠。

今天，我們要使抗戰勝利，那麼動員全國民衆，使全國民衆都能有組織地參加抗戰，不用說是絕對必要的。而且今天抗戰已經進入新階段。所謂「新階段」，也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爲保證統一戰綫的鞏固，以及爲了保證今後「民主共和國」建立的基礎，民衆運動更是有絕對發展的必要的。但今天中國的民衆運動還不夠開展。這不開展的理由，丟開了客觀上的條件來說，那麼在主觀上，一般從事民衆運動的人，他不能抓住現階段民衆運動的特徵（或者雖抓住，而抓得不够緊）就該是一個最大的理由。

因爲不能抓住現階段中國民衆運動的特徵——或者甚至還不能瞭解民衆運動的一般性質——因此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就在工作上表現出了它的不够展開統一戰綫。在工作上不是因爲與政府有了對立的意味，不能展開工作，就是因爲與任何政黨有了對立的意味，而也因此不能展開工作。（一部份人把民衆運動的作風政黨化了）

果然，一件事情的造成，往往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單將民衆運動的不能開展，完全歸過於當前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在政府方面，在政黨方面有一部份人士對於民衆運動的瞭解，事實上的確也須要修正的——但至少過去中國的民衆運動是雖然已經認清了目標——統一救亡的目標——可是却還不會能大踏步的去做，總是一件事實。

在這抗戰已走上新階段的今天，民衆運動如果還停留在過去比較狹窄的圈子內，不能有飛躍的進展，這對於抗戰，對於建國，都是不利的。

爲了要建立新的獨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國，我們民衆運動者應當克服過去的作風，而向新的方向邁進！

論集體生活

——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的檢討——

社會上所有的人們，在知識與成就方面，各不相同。一個國家裏面，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分別，這種分別，往往被認為是『先天的』區別。全世界的人類，又有黃、白、黑、紅等顏色的區別；歐洲資本主義發達以後，白人利用『得天獨厚』的說法，高舉着人種優勝論的大旗，倡言傳播文明，便『理直氣壯』地侵略弱小民族。但近數年來，德國法西斯蒂發現了雅利安人（Aryan），是白人中最優秀的，根據這先天的『超羣絕倫』，要在歐洲稱雄。而日本帝國主義，則發現黃色的大和民族是天神的後裔，正在『替天行道』，要征服中國，獨霸東亞。而中國也有學者指出了中國人的不可救藥的『劣根性』，一口咬定，認為這種劣根性是先天的，無可挽回的；於是根據了『科學』的觀察，而生出中國必亡論與民族失敗主義。有的還苦口婆心地鼓吹優生學，抱改良中國人種的宏圖。但是國家強弱對於各個中國人的先天是否有關係？中國人是否有不可挽救的劣根性？每個人對抗戰建國，要怎樣努力，才能達到目的，這都是值得我們研究討論的問題。



一 生活的個人與社會的個人

有人以爲國家強弱文化高低，與種族是有關係的，而個人在事業上的成敗也有先天的基礎。他們以爲歐美國家之所以進步，是天賦特高的生理與智力的表現，目前原始民族之所以不進步，全由於他們的生理與智力不如別人的緣故。但是許多學者研究的結果，並不如此。譬如據美國人類學家 Loas 研究的結果，推翻了『文化的成就由於智力』的假定，因爲事實已證明這是錯誤的。(註一)至於文化更高的成就與更高的智力，亦無固定的關係。(註二)美國社會學教授烏格朋 (Ogburn) 研究的結果，很肯定的提到人性的『突變』是非常緩慢的，而在很長的時間內，極不顯著的。他說：

『冰期以前，人性 (Human Nature) 也許有些變遷，不過冰期以後的變遷，却未經我們證實。所見到的都是人性和文化表現的變遷。這種變遷說它是文化的變遷，而不是由於人類生物性質變遷是可能的。……文化變遷與生物變遷並不發生很大的關係，至少在冰期以後是這樣的。』(註三)

我們拿就近的例子來說，近數十年內的日本文化變遷，可說是快極了，但是誰都不能說日本文化的變遷是由於日本人的生理心理的突變所致。美國青年的身材，比前一代，平均要高出二英寸，但是這二英寸的生理變遷，對於美國文化有什麼影響，生理學家與社會學家至今還無法實證。德國猶太人的生活，被法西斯蒂政府殘酷的壓迫，所有財產

(註一) F.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 p. 29.

(註二) 同上三四四頁。

(註三) W. E. Ogburn, *Social Change*, 1922, pp. 134-35.

盡被掠奪，這不能說因為他們的智力與生理忽然一落千丈的緣故罷！一個非洲的黑人或紅印度人，普通被認為是原始民族裏的，但是有的黑人及紅人，很小就運到美國，予以相當的教育機會，他們立刻證明他們可以說英語，可以得博士學位，可以做其他美國人能做的而自以為了不得的事，與美國人並不相形見拙。故文化的不同，決不能說是由人們的生理與智力的不同所致。（註四）

那麼心理上的所謂『本能』所謂『人性』普通被認為對於各人生活上有重要作用，所謂『食色性也』『如何能抹殺不論？』是的，每人需要飲食是本能的，到了成人有性慾，也是本能的。但是這種本能所表現的姿態，隨着不同的社會文化而改變了。游牧民族的食物種類與吃法，比白人的中國人的食物種類與吃法，完全不相同的，各依各的文化條件發展着。至於『色』的表現也何嘗不如此？中國以前的結婚，男女是『素昧平生』的，但現在要講究戀愛了，有的男女，因為工作或生活關係，還抱着『違背本能』的獨身主義，但是他們仍舊很快樂的生活着。總之，本能是一種動力，它的表現的姿態，是由社會生活決定的。我們常發現各種不同的人們，在一種環境中，會發生同樣的反應，而同樣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中，就會有不同的反應。所以要拿本能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可能的。

至於人性，文豪蕭伯納參觀蘇俄以後，在無線電台上對美國人講以下一段關於人性的話：

『你決不可以認為在俄國與美國的人性是一樣的。我的朋友，美國駐俄大使道斯（Davis）將軍對我談及人性，他說無論你如何改變社會制度，你不能改變人性的。你們現在去俄國以前，最好用科學方法，把人性研究一下，最方便的方法是到就近五金店裏拿一團油灰來，油灰正像人性，你不能吃掉它，也不能使它生出蘋菓來，也不能拿

它當衣服穿。但是你能扭它拍它拿它來塑造，使它變成你所需要的各種形狀。當你把它做成一種形狀，它以後漸漸變硬了，硬到使你以為無論如何不能改變它的形式。現在俄國的油灰正與美國的油灰一樣，……而蘇聯政府已將俄國油灰很細心的改變成與美國不同的方式，而且已經發覺，產生了一種極不同的動物了，他們的鼻子沒有變，他們的耳目類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內部的活動，不是美國式的了。他們的是非之心，特別不同得使人驚奇，所以有的美國人認為可以驕傲而榮耀的事業，在俄國變成了聲名狼藉的罪孽了。」（註五）

由上面的演講，我們知道研究個人，不能與他所處的環境分開來看的，倘若專從生物方面心理方面研究，愈研究恐怕愈要糊塗。

一個人人生下來的時候，當然是生物的個人，剛出世的孩子，不能自助，他是無知無識的。他在醒的時候，有各種無規律的動作；對於環境的刺激，也有簡單的反應；後來，受了社會的撫養，他就在生物的基礎上，漸漸罩上了一個社會的模型。他的動作，漸漸得到社會的反應（如哭了就有奶吃等），便發生了意義。他越長大，與社會的關係，越來越複雜，而他的個性，態度，願望等，也在社會的經驗中，漸漸依照社會的意志形成着。

孩子在發現別人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而『我』的觀念，因與人們發生關係，越來越多，也跟着有繁雜的發展，他對父母發現他是兒子；對哥哥，他發現他是兄弟；而對兄弟，他就變成哥哥了。等後來讀書，遊戲，交友，結婚，做事等時候，他又發現各種不同方面的『我』，這多方面的『我』的總和，就成為社會的個人。

所以個人是與別人相對而言的，是與團體相對而言的。也只能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在團體的生活中，去發現個人。

（註五） 蕭伯納，對美國的演講（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紐約，蘇聯友社出版（英文第四版）十頁。

去表現個人。沒有別人，就沒有我；沒有團體，就沒有個人。所以對於個人生活的檢討，不得不從團體着眼。

二 個人與社會是一個過程的兩方面

上面所講的是生物的個人，如何受社會的影響，變成了社會的個人。但問題還不止此。因為個人在開始的時候，他雖然完全受社會影響，後來個人在和社會來往的過程中，也漸漸影響社會了，其實他本身在社會存在着，也就是一種影響。

集體的生活，好像座談會，在討論的過程中，各人互相發表意見，互相得到啓示而作進一步的討論。而討論的結論，是大家公共的。但它決不是各人意見的總和。它是大於總和，它是集體的意見辯證的總化合。由個人而論，所謂個人以外的社會，並不是在他外邊，是在他裏面，在他自己的皮膚裏。他是整個社會分不開的一部分。他的行爲與思想，都是社會的一部分。他的個人的發展，就在整個社會的過程中。他與社會是互相創造，互相依賴着。矛盾着統一着。是一個過程的兩方面。

倘若有人懷疑這個解釋，只要請他拿自己一天的行動思想，來分析一下，他便會發現沒有一件事不是與社會發生密切關係的。就是所謂創造，也不過是根據過去的與眼前的經驗，看出了新的關係罷了。即使是魯濱遜的荒島生活，我們知道當他初到荒島的時候，已帶去了無數的社會遺傳——他的知識與經驗。他在島上一切的生活，仍用着他所知道的社會模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古今中外的人類的生活，沒有不是合羣的。不然就沒有個人，更談不到生活了。所以團體與我共生，社會與我爲一，我是小社會，社會就是大我。

個人與社會中所養成的習慣，也就是社會風俗的另一面。個人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全從團體中學習來的。因爲一

切行爲的意義，全是由團體給他的。譬如小孩子有了一樣玩具，他的小朋友們說不好，他就也會覺得不好了。女子的衣服與頭髮的樣式，受團體標準所支配，是非常明顯的。但同時她們也在時時創造變換樣式。至於個人說話的腔調，及所用的字眼，全脫不了團體的標準。如鄉下人進城，看他衣服舉動及說話，立刻就顯出他是那裏人。

同時人們在生活的過程中，爲方便起見，在有意無意中也不斷地在改變舊風俗，不斷地在創造新的。譬如經濟制度教育制度新的憲法等等。新的制度，就生出新的生活標準，造成了新的生活基礎與方向。等到習慣成自然，使各人的生活融化在一起，遇到新的環境，又要改變了。這就是文化的演化。

因爲個人與社會是一個過程的兩方面，社會中各個人就變成文化的所有者，文化的傳遞者。當然，在一個複雜錯的社會裏，沒有一個人能參加社會各方面的生活，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占有所有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占有得更多一點，有的少一點。這好像知識份子的文字一樣，他所懂得的文字，決不是一個社會裏所有的一切語言文字。所以各人所代表的文化，只在他生活範圍以內而言；他受他在社會的地位的限制，受他在階級及其他團體的限制。參加社會生活方面最多的人，就最能代表社會，像史太林在沒有階級的新社會的建設的各方面，都有他重要的貢獻，所以讀他的傳記，可以像巴比塞說『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了。

人羣的關係，好比演戲，各人的行爲態度，看他所扮的角色而定的。社會上一切的倫理關係，就像戲台上的台步，不管你是小生，鬚生，花旦或小丑，只要你對自己所扮的脚色，做得像，就是好戲子。倘若各種角色，能盡力於範圍內規定的唱做，串插起來，就是一齣好戲。社會上各人按他的地位，做他本分內做得恰到好處。大家串插起來，成功一個有秩序的社會。

越在悠久歷史的穩定的社會生活裏，個人的生活範圍，被規定得越爲嚴密；未生以前，各個人的角色，已被排定

了。男孩子應當如何，女孩子應當如何，成人了應當如何，做父親了應當如何。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倘若
是父親，必須有像父親的台步唱做；不然就不成話了。在中國舊社會裏，倘若父親與兒子常開玩笑，別人就要嘲笑說，『
呵！他們那裏是父子，簡直像弟兄了！』換一句話說，就是做父親的錯了台步，失了身分。此外做生意的，就得學商場上的
一套對付，走江湖的，就有走江湖的一套。在理想的社會裏，一定要將個人的行爲『止於至善』，而中國舊社會中個人
至善的行爲，就要像書上所說的，『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
是說每個人的思想行動，決定於他在集體中所處的地位，決定於他對於羣衆生活行動的參加。雖然在目前轉變得很
快的中國社會裏，個人地位的規定，沒有像以前那樣嚴格，但是團體對於各個人的行動，仍有新的關係，新的規定。就是
破壞社會秩序最厲害的土匪強盜們的團體生活，也有規律的，此所謂『盜亦有道』。

生活是奮鬥的過程。個人在集體中的生活，就是參加這集體的奮鬥。倘若個人對於有的團體，關係並不密切，他可
以隨時脫離，譬如在店中不願做生意了，可以辭職另謀出路。但是有的是基本團體，離不開的；像中國舊社會的家庭生
活，像現代中國的民族生活，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在這範圍內活着，你死也得死在這範圍裏。離開了這範圍，你就沒
法生活了。這種團體生活，可說與個人打成一片了。不作共同奮鬥，就沒有出路。這種生活，正如參加團體賽球，你的努力
參加，不是爲個人勝負而奮鬥，你得幫助你的團體，共同配合着奮鬥；以期獲得團體的勝利。不然，就決沒有個人勝利的
機會。因爲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而個人的利益，寓於集體的利益中。

倘若個人在集體中失却了作用與地位，不能再與集體打成一片，即不能獨自生活下去，便不得不自殺了。譬如中
國舊家庭中女子的生活，是依附于男子的。一旦男子死去，她既失依附，又不能再嫁，社會上已規定他爲『未亡人』。家
族的團體內，沒有她什麼地位了。倘若沒有後裔的少婦，無人撫養，前途不堪設想，於是自殺便是很自然的出路。而社會

爲本身方便計用了節孝的名義，裝點這種自殺。又如民國以後，有的知識份子，他一生所研究的，他的整個思想系統所依歸的，是三綱五常舊道德舊倫理，同時對於新潮流，素無接觸，不知適應，一旦被丟在民國的新社會裏，覺得失去了舊制度，失去了他的一切。他與舊社會的關係太密切了，所以活不下去，只得自殺了之。北伐勝利之後，王國維先生的自殺，就是個好例子。至於因爲環境的劇變，個人因經濟沒有辦法，不能維持生活而自殺的，更爲顯然，無容贅述了。

個人的生活，雖由集體決定的，但有時因爲集體很龐大，變遷得也很快，不能爲一部分個人所了解，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爲調整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宣傳工作與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俄國革命以後，一個布廠裏的女工罷工了。她們開會反對當局，一位年老的女士鼓動着大家，說：『從前在沙皇時代，我們被資本家壓迫剝削，他們不管我們的死活，要我們做他們的奴隸，強迫我們多做工，現在革命以後，說得很好聽，有了工農政府，但是仍舊一樣強迫我們多做工，仍舊壓迫我們剝削我們。我們將誓死反抗……』後來一位少共書記，向她們解釋說：『要你們多做工，不是剝削你們，因爲革命以後，我們的生產工具，多被敵人破壞了。但是我們工農同胞沒有衣食住，是不能維持下去的；現在全俄國是我們的了。我們這裏用的煤，是某處煤礦工人開採給我們的，我們的鞋，是某處工廠供給給我們的。但是他們沒有衣服穿，他們是我們的同胞，等着我們能供獻衣料給他們。我們多做一點，他們多有得穿一點，我們做得快一點，他們就少冷一天，我們是爲我們自己階級的同胞做工，不是爲資本家生利……』後來仍舊這位抗議的老女士起來答覆說：『既然如此，我們試一試看罷。』到第二天，廠內所出的布，遠超過當局所要求的定額。

這個結果，是因爲女工們瞭解了所處的新的集體，瞭解了自己是大社會的一分子。因爲工作的意義不同，工作的效率也變更了。從前女工們爲廠主做牛馬，後來爲全國姊妹兄弟們服務，而同時瞭解全國的兄弟姊妹也正努力爲她們服務。宣傳的功用是使舊的女工們，看見了新的集團關係，與新的集團打成一片而努力。這是使自在的集體生活。

轉變到自覺的集體生活，再由自覺的集體，進一步到自爲的集體生活。

當整個社會發生矛盾，在社會中的各團體，也發生了矛盾，與各種矛盾團體有關係的個人，在他的內心，也要反映着矛盾。例如一二十年前的青年，在學校裏聽教師講科學，回家後聽家裏講鬼神，在雜誌裏看到反對吃人的禮教，主張自由結婚，而家庭要他實行舊道德，命令他與不相識的人做夫妻。社會上主張破除迷信，父母要他拜菩薩，弄得青年陷入不能調和的矛盾中。有一部分青年，屈服於家庭團體，結果苦悶萬狀，產生了頹廢的情緒。大部分的青年，與社會新思潮打成一片，反抗舊禮教，做了社會運動的先鋒，向新時代邁進了。

勞資的衝突，也是社會矛盾，形成了兩個階級。而大家知道，個人鬥爭不能生效，於是大家組織了集團，用集體來鬥爭。而且由于生產方式的決定，在大規模的分工生產的底下，勞工們成千成萬的集合着，造成了集體組織的基礎。

社會對於罪犯，倘若犯人是個別的，還容易處置，因爲他還是團體的一份子，容易受社會制裁，等到犯人們組織了幫口集團，來侵害社會，不獨他們作惡的力量大增，而且制裁的方法，毫無效力。他們越受社會的懲罰，在他們自己的集團中，越覺得勞苦功高，越有地位。並且他們集體勢力大了，反而制裁着社會，使他們可以橫行無忌。至於漢奸問題，大多因爲他們家庭的觀念，重於國家觀念，他們的領袖慾，勝過了對於國家的忠誠。這就是他們所受于舊社會的封建意識，沒有可能去掉。

這種問題，全因爲整個社會發生根本矛盾以後所產生出來的，不根本剷除社會的矛盾，而處置個別問題，是徒勞無功的。

三 中國人本有的「特性」是舊社會的意識形態

我們發現中國人的『特性』或『劣根性』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比較以後，應于中國現代的需要反映出來的。敘述這篇文章很多，而刺刻中國人的特性最淋漓的要算久在中國作傳教與社會事業的美國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註六），不過他與大多數作者一樣，只敘述特性的存在，而沒有解釋其所以存在的理由。現在將普通所謂特性，略加討論。

中國本來是一個封建的農業社會，一切所謂特性，全可說是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一般中國人在封建的農村經濟結構裏討生活，大多是物力維艱，財富缺乏，而且對於天災人禍，毫無保障，所以養成了『撙節』的特性，以便『積穀防饑』，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講究舒服的。同時對於堅苦的生活，不得不逆來順受，養成了有『耐性』的特性。對於工作方面，不得不孜孜矻矻的勤苦精神，沒有辦公時間，沒有休息的星期日，也沒有種種的假期。（這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工作者所受不了的）所有的是讀書人的焚膏繼晷皓首窮經，工農的終歲勤勞與商人的孳孳爲利，鉅細不遺的精神。

在這種層層剝削的封建社會裏，人民在順境固能優游自得，在逆境也只能安之若素，而養成『知足常樂』、『樂天命』的特性。因爲『逆境之來，論理既知其不可抵抗，論力知其無法抵抗，唯一的應付方法，自然惟有儘量遷就；祇有在遷就中還可找到一條心安理得的出路。』所以不得不學會了『鬧中取靜忙裏偷閒』，『安步當車，無罪富貴』，以至於『布衣暖菜飯飽』便是福氣了。

在堅苦的農村社會裏，農民終歲勤勞，尙不能溫飽，所以專靠勤儉，不能起家立業的。而且單調的工作中，很少有意

（註六）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英文原著早已絕版，潘光旦節譯後把它編在他的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的第二篇裏（商務出版，一九三七年）

外發展的機會，要發財除非升官，或者掘藏不可，但這種機會，農民得不到的，於是不得不說『一兩黃金四兩福』而相信『富貴在天』的命運主義了。

農村社會的經濟結構，以村鎮爲單位的，用不着工業社會的交通網，又因爲農民與土地有密切的關係，若離井背鄉，就沒有生路了。於是『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安土重遷』主義。但是後來山東一帶爲災荒所逼，許多人移到東三省及俄國去了。廣東因爲交通方便，商業繁盛，有許多人遷移到南洋及美國那裏去了。

堅苦的農民生活，還有一種『沒有神經』的特性，也被中外人士所注意，他們指出中國人的鎮靜，不忙，鬧中睡覺的本領，苦裏忍痛的本領，不好運動，及在擾亂的環境裏能泰然安處，與西洋人的神經過敏，不耐煩，講效率，好運道等比較，覺得中國人有隨時隨地處之泰然，行所無事的本領。其實這是農民生活的普遍性，以前俄國及其他各國的農民，也都如此的。還有一位中國學者，也痛恨中國人麻木不仁，以爲要改造中國，先得使中國人在吃飯時，旁邊有人出恭，不致漫不在乎才行。其實這因窮人生活簡陋，沒有辦法的緣故。但是中國大地主及官僚富翁的家中，他們有錢可以富麗堂皇地講究生活，決尋不出當他在花廳進膳的時候，有人可以在旁邊逍遙出恭的。

中國人的『不守時刻』與西洋人的『時間即金錢』；中國人的『不求準確』與西洋人的『標準化』；比較起來，的確大相徑庭。其實這種『特性』就因爲農村生活簡單，團體範圍很小，所做的事情不多的緣故。與別人約時敘談或做事，你用不着說幾點幾分，早一點或遲一點，不會担誤別人的事情的，不像大城市裏大家忙得要命，會談與共同做事的時間，是大家在百忙中擠出來的，一有遲誤，便要担誤其他事情，倘若大會演講，遲到了就要使許多的人在時間上受損失，而且大家是忙着掙錢，所以在這種工業社會的環境中，『時間即金錢』了。至於不準確，也因爲生活簡單，製造品全是手工業，不像機器有標準化，全國度量衡的漫無標準，正因爲全國各地沒有多少來往，沒有一定標準化的迫切

中國人的『自私自利』，因為以前中國除了家族集體生活以外，沒有什麼大團體的生活，個人在家內，為家庭是絕對不自私自利的。但是家族以外的人，不是『自己人』，沒有團體關係，沒有集體生活的規律，所以要『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不管家以外的閒事為原則。而且在當時也沒多大事需要管理。譬如道路罷，那時只有『官道』沒有『公路』，有時近村的橋路，村人出錢修理的目的，不是為家族以外的公益，乃是積德於子孫，像平劇狀元譜裏陳伯愚說，『為兒女俺也會鋪路修橋。』對於殘廢人，遇難人及婦孺等問題，本來全由大家庭救濟處置的，家族以外的人，當然顧不到了。到了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裏，這種問題也漸次擴大，同時也漸漸有公衆團體出來負責這公衆事業，而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政府完全負責辦理了。

因為中國人專門對於家族的團體負責，而家族以外，沒有更大的團體，所以對家以外的事，也沒有道德的責任。通商以後，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有了家族以外的社會關係，於是有了種種困難。譬如個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往往因濫用私人（家裏的人）或眼目不清，以致失敗，這完全因為沒有大團體生活的訓練與經驗，而家族的勢力還沒有打破的緣故。中國人小而至於措油，『打秋風』，敲竹槓，大而至於做漢奸賣國，都是一貫的政策——家族主義高於一切的政策。

等到國家危急，需要全國人民一致起來的時候，於是發現中國人像『一盤散沙』，組織不起來；但這並不是中國人沒有組織能力，那是因為過去沒有這種大團體組織的需要，也沒有這種組織的經驗，再加上過去政治勢力對民衆組織橫加阻礙。雖然民族資本早已在開展，全國漸次在經濟上統一起來，已有了全國社會組織的基礎，但是全國大集團的組織，至今還有困難。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就覺得民衆缺乏應付的力量。雖則全國人民有救國熱情，但時過境遷，這

種熱情也就消沉下去了。於是有人說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熱度』其實民衆愛國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的熱情，本來不十分持久的。問題在乎如何使這救國熱情，通過了組織，與理智配合起來，用各種組織的集體力量，繼續努力奮鬥。我們所謂『持久戰』在人力動員方面，必須是提高認識，擴大組織爲基礎。

以上所討論的中國人的特性，或劣根性，不是天生的本性，乃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狀況下大家庭制度下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只要經濟基礎改變，社會組織改變，這種『特性』也就隨着改變了，但在社會組織未曾根本改變之先，却有改變可能之時，造成了某種社會的總形勢，那也可使所謂『特性』改變的。現在中國人的特性也正在改變着。這就是馬克斯所謂『全部歷史，不是別的，只是人性的不斷的變更。』（註七）所以問題不在乎咒詛中國人的『劣根性』，也不在乎先天下之憂而憂，去提倡『中國必亡論』與『民族失敗主義』問題在乎如何共同合作努力去改造舊社會，去擺脫舊有的意識形態的桎梏，去共同爭取新社會的建設，去創造新的意識形態，中國人的新特性。

四 集體的的努力才能改造社會

但是要改造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把它建設起來成功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不是各個人或少數人的努力能够奏效的，也不是全國人民各自努力能够辦得到的。這樣偉大的神聖工作，需要全國人民一致在大集體之下共同努力，才能有成功的希望，特別在這敵軍猖獗，土地被淪陷，口岸被將鎖，工商業被破壞，教育被摧殘的存亡危急關頭，尤需全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團結起來像一個人，組成一個龐大無比的力量，才能有機會把敵人打出國境，才能有機會來建設新中國。

倘若個人不與集體打成一片，不管他如何聰明，不管他如何努力，不能有什麼成績的。因為社會沒有一件事可以獨自一人辦理，即使是極小的事，也得通過或借助別人去辦理，而別人有他自己的計劃，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如其各人儘管自己，不從社會團體大處着目，那麼各人的計劃，互相阻礙着，互相衝突着，結果不得不互相取消了。

同時，個人的努力，還受着社會可能性的限制。在現階段的社會裏，工人的兒子，不管他如何有天才，決不能有機會進學校，隨父親去做苦工，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了。一個妓女，倘若要努力改變自己環境，不願意再去拉客，但是倘若她尋不着正當職業，他為生活計，不做妓女，有什麼辦法？做盜賊的，雖然極願意棄邪歸正，力圖上進，但是社會上失業的人到處皆是，即使他立誓不再做盜賊，因為尋不着正當出路，被饑餓所逼，如何能不挺身走險，明知故犯？

即使個人已有充分的訓練，願意將自己的技能供獻給社會，但是因為整個社會矛盾百出，他的技能的運用，不一定有益於社會，或者反而有害，也說不定。譬如一個工程師，他抱了振興實業厚生利用的宏願，他把工廠辦得非常興盛，但他的努力，竟為資本家造了許多財富，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受人剝削的勞工，倘若他在淪陷區裏發展實業，那就在做資敵的工作了。又譬如郭沫若先生，本是學醫的，但他不願意行醫，他說：

『行醫！醫學有什麼用？……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

『……醫學有什麼用？能够殺得死寄生蟲，能够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了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們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裹纏……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要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註八）

我們退一步想，假使認醫生的工作，是完全爲民衆服務的，那末：

『在中國只有登記的醫生九千位（醫院內的護士除外），這數字和其他國家比較，並不能算是怎樣的落後，但如果以全國人口的比率去計算，結果是每五萬四千人中，只能共有一個醫生，那就很足以驚人的了！農村的不足，都市的有餘，形成了目前太平平衡的現象。』（註九）

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就因爲社會沒有成功一個大集體，不能組織起來的緣故。於是醫生得不到充分服務的機會，而民衆也得不到醫生的服務。當打破這種無政府的狀態，不得不先努力全個民族的發展，努力整個國家的出路。只有團體決定個人，個人不能逃避團體所遭遇的命運。要爲自己謀解放，謀幸福，先得爲民族謀解放，先得爲民族謀幸福。只有團體有獨立自由個人的獨立自由，就有了保障。但是歷史是人們自己製造的，爭取民族解放是一個極堅苦的過程，只有集體的努力，才能爲民族謀得解放爭得自由。

我們現在主張集體，與以前的集體，絕對不同。以前中國所有的集體，只是家族的集體，小的集體，所努力的問題，也不過限於家族的幸福。現在我們要爲這偉大的民族謀解放，不得不將全民族組織成一個空前偉大的集體，來一致對付強敵，有了這個集體，才能產生偉大的羣衆的力量。但是組織四萬萬五千萬的民衆，不是一紙命令或一番宣傳就可以有效的，這是要每個人對於這大集體，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極大的努力，才能造成的。

以前的家族集體是在長期的生活中，不自覺地形成成功的。現在民族集體的發展情形，完全不同了。我們在近百年來受了帝國主義不斷的壓迫，而漸漸發生了民族自覺性，以前幾千年的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自在的民族，人民並沒

（註八）上海大美晚報月刊，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註九）同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

有感覺到什麼，但是目前在敵人的全部海陸空軍的侵略之下，中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盛衰，人民的幸福，全在我們抗戰的成敗決定了。所以自覺的民族，當即刻變成自爲的民族，才能達到抗戰必勝的目的，才能建立新中國，因爲時機迫切，沒有長時間，可以從容組織，所以越需要民衆的自動努力才有成效。

雖然要把偉大的民族，成爲有組織，有力量，是一件空前浩大的堅苦卓絕的事業，但是因爲我們的民族已是自覺的民族，目前有日本全面侵略的客觀條件，緊逼着我們，使我們感到嚴密組織的需要，政府有抗戰建國綱領給民衆努力的總目標，再加上國共兩大黨的不斷指導，民衆要自動組織起來，就輕而易舉了。

這種偉大的集體組織，是民主的組織，使民衆在組織的過程中學習着，使民衆盡量貢獻着集體的智識和經驗，使集體的腦筋不斷地工作着，集體的力量也不斷的生長着發揮着。各個人通過了民主的集體，才能把自己的最優秀的力量，自由發揮出來，來應付集體對他的要求。集體越擴大越民主，各人的力量越有自由發揮的機會，集體的知識與經驗也隨着擴大增加。而根據了更豐富的智識與經驗，便可以更有力量地更準確地而且更普遍地運用所有的集體的力量了。並且可以訓練出許多民衆的領袖，來指導偉大的集體運動。

民族革命戰爭的成敗，那裏能與團體賽球，相提並論。但是在賽球的時候，各個人在他的崗位上，當如何去努力與全體配合起來，一致對付敵人，在危急的時候，只要一人大意，全體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失。在民族革命戰爭中，集體的團結，更是需要了。各個人應當消失在集體中，變成與集體分不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有鐵的紀律，因爲越有紀律越能團結，各個人的力量越能化合成一個集體的力量。

這偉大的民族集體鬥爭，是要求犧牲的，但只要有絕對民主化的而同時有鐵的紀律的集體，使個人有最大限度的創造力，在集體意志集體利益的前題下表現着。同時使個人完全受集體的利益集體的意志支配着，那末個人在集

體中爲爭取民族集體利益而犧牲，非獨沒有問題，而且會勇躍參加的。因爲民族解放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只有鬥爭才有生路，不然，亡國後只有死路一條。所以這種犧牲是爲光明的生路而犧牲的，沒有不勇躍的。所有的革命的鬥爭，全是奮不顧身的就是這個緣故。

馬克斯說：『人類決不會不能完成它自己負起來的使命。』他又說：『歷史的行動越影響人們生活，努力參加的人們也越多。』（註十）這兩句話，用在抗戰建國階段上，最恰當沒有了。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中華民族，已負起了神聖民族抗戰的使命，向前邁進，日本越是瘋狂的在中國作全面侵略，中國的民衆越團結起來，世界反日的統一戰線越在那裏開展着，越增加了抵抗的力量。在現階段上，我們已粉碎了敵人『分而治之』的策略，已支持着持久戰爭，使敵人疲於奔命了。在世界法西斯侵略戰爭與民族大革命的潮流中，中國人民已負起而且一定要完成那打倒法西斯主義的偉大的使命。至於何時才能完成，要看我們的集體如何努力而定了。

五 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同時也改造了自己

人類改變環境創造環境，同時環境也改變人類，這兩方面是交光互感着發展的。『當他對本身以外的世界發生作用而改變它的時候，他同時也改變他自己的本性。他發展他的各種潛伏着的能力，使這種能力受他指揮而起作用。』（註十一）但這種變化在戰爭過程中特別顯著，特別迅速。我們將描寫蘇俄革命戰爭的鐵流來作個例子

（註十）引自 Plekhanov: *Fo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p. 96.

（註十一）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一九八頁

研究(註十二) 作者所描寫的是十月革命內戰時期南方哥薩克農民的鬥爭，這種農民、游擊隊和難民的羣衆，在開始行動的時候，可說是烏合之衆，不容易節制的。他們「不了解集體的意義的，他們完全只在關心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郭如鶴是他們的領袖——也是他們的玩具，有的時候，幾幾乎要把他亂槍戳死。」(註十三)

但他們在長征途上，屢次受到全副武裝的白軍的襲擊，屢次爬過峻峭高山，「經過了都想不到的痛苦，克服了神奇古怪的障礙，」這一羣烏合之衆，也就鍛鍊成了不可侵犯的有組織的集體力量。等到達到目的的時候，這羣衆已經完全變成另一種人，一點也不像原來的樣子了。現在游擊隊和難民對領袖一齊叫着：

『萬歲！我們的爸爸！……長生萬歲！跟他走到世界的盡頭——只要是擁護蘇維埃政權，我們總去打。打老爺，打將軍，打軍官……』(註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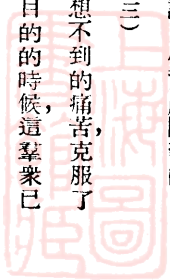
革命過程是一個大熔爐，它把各人的各種過去不同的背景，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的人們，農夫，漁夫，水手們，家庭婦女們等的背景，全在大熔爐裏熔化着，熔化出統一的意志，統一的目的地。昨天鐵流的難民還只知道瑣屑的關心着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成效，只知道那種澈底的個人主義的小世界，有這麼一隻小牛，一隻羊子。而且許多雖不反動，却是中立的，常常因為個人小事咒詛革命。可是革命的風暴，始終連老婆婆郭必諾也不準中立。革命教育着從階級關係上決定着一切，使她也開始認識革命的真理在什麼地方。這是革命過程中的一切客觀條件已經把這些羣衆訓練得完

(註十二) 綏拉非摩維支著，曹靖華譯，鐵流，一九三八年生活書店出版，關於鐵流的討論，請參考 G. 涅拉陀夫的序言，史

鐵兒(瞿秋白)譯。

(註十三) 鐵流，序言二六頁。

(註十四) 同上



全能够迎受革命的理想，而且爲着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而開始深刻的行動。『就是脆弱的人，也極快的受着傳染，他們的英勇，在平常日子的範圍之內是想都想不到。』（註十五）推動着大家向前去的是總的目的。提鍊出各人的內在潛伏的能力的是革命的大熔爐，在鬥爭的緊張之中，現實與希望之間的界線消滅了。理智和情感也調和了，混合了，而這種過程正是勝利的保障。

這種以農民小資產階級而聚合起來的散漫的羣衆，革命尙且能够這樣地改造它們，那麼被日本全面侵略的中華民族，現在已在政府和國共兩大黨直接引導了進行着全面抗戰，又要開展怎樣鉅大的民族革命遠景呢？對民衆又要開展怎樣偉大的改變呢？

這次日本全面侵略與中國全面抵抗的長期大血戰的過程中，兩方參加戰爭的人們，同時在改變着。不過日本的戰爭是退步的，是野蠻的，他們兵士的變化，也向這方向發展，而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與正義的，所以我們的變化就在向進步的方向開展着。

現在先說戰爭對於日本兵士的變化罷。日本著名的小說家石川達三氏，曾到中國江南一帶來實地視察戰跡與許多『皇軍』的兵士接談之下，獲得許多戰爭的知識與感想，著了一篇未死的兵（註十六）描寫戰地的實際情形，雖被日本當局大大刪改，以致後來禁止發賣，我們還能看出日本兵士們在侵略戰爭過程中的改變。作者指出『戰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力同化作用，莫名其妙之間，使一切戰鬥員都變成同樣的性格，作同樣想法，同樣要求。』譬如像醫學士一等兵在戰爭過程中失去了他的理智。在佔領區裏殺了中國女子以後，他不知『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生

（註十五）同上三〇頁

（註十六）石川達三著，白木譯未死的兵，五洲書報社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

命這件東西，在戰場上是如何被人家輕視，侮辱啊！他想：『無論是敵人或是戰友，被人家做殺戮的目標實在是對醫學那學術的侮辱，自己是一個醫學者，但是居然侮辱醫學。』『我的生命怎樣呢？倘使我的生命也受敵軍輕視的話，那末在我生命上的醫學又將怎樣呢？一定是被人家輕視了。』『這樣想來，他覺得走入迷途，感覺混亂』了，於是不得不用刺激來『打斷他的思索，對旁邊的兵士說：「剛才被我殺死的姑娘真漂亮，給她活着多好啊！」』

後來他被調到上海，在『虹口』已經找不出戰跡，他在酒吧間與舞女痛飲狂歌以後『又感覺一種迷惑，』『大概是用不到和戰場妥協的緣故。』他感到『在這裏，生命是被尊敬的，由於法律，由於道德，由於宗教，更由於良心，別人的生命是不許侵犯的；同時自己的生命也受別人同樣的待遇，這樣，自己的醫學方才也受尊敬。』他自己叫：『啊呀！我還活着。居然還活着……』

還有譬如從軍和尙片山，在戰場上也改變了。他『在寺院裏勸人家爲善作福的時候，他自己信宗教是超越國境的；以爲在印度，在中國，在日本同樣的宗教，受同樣信仰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這是非常簡單的信仰方法。出寺從軍的時候，他也想對中國軍的戰死者祈禱，但是到戰場以後，心境完全改變了。』他也用殘忍的方法殺人了。別人問他，他說：『當然殺囉！我也是和別人一樣的。』他並且堅決不肯對於戰死的敵人祈禱。『他所以尙被稱爲宗教家，不過因爲他知道經文，知道葬式而已。他脫去僧衣穿上軍服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和尙的素性而同化於兵士的心理了。』

當日本兵士由華北被運到大連去的時候，誤認爲回國了。『凱旋啦！沒有一分鐘，傳遍了整個的列車。萬歲！凱旋啦！已經不想能夠再見故鄉的河山和家庭，而居然又可以實現了，大家的欣喜是沒有辦法制止的。』但當他們被命令上船到新的戰線上去以後，當船『駛出大連，兵士們打開圓窗，默默地望着遠開去的大連和附近的小島，把買來的禮物都拋在海裏，倒在鐵格子的床上，靜悄悄地睡了。』

上自軍官下至兵士，大家『感覺到心的空虛』、『感覺一種迷惑』、『感覺到『神經是支離滅裂了』』所以不得不
用極強的刺激來克服自己的迷惑，不得不用極殘酷的行爲來掩蓋自己的空虛，來統一自己的支離滅裂。同時憑藉了
對天皇的宗教麻醉力與傳統的『皇軍』的榮譽，才能維持着戰爭的進行。但這種局面不能持久的，矛盾遲早會到發
展得不能統一，不能克服，不能掩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夠持久抵抗下去。

戰爭在中國方面是革命的戰爭，是正義的進行曲的，有偉大使命的，與日本兵士適得其反，與鐵流的革命戰爭相
彷彿的，但又有更大的進步可能性，超於鐵流所描寫的變化。這種變化正在各方面開展着，譬如在軍隊方面，軍紀的日
漸嚴明與軍事的越加統一，已是衆目昭彰的事實，四行孤軍的奮鬥精神，到處在開展着，壯烈的犧牲，已成常事；軍人的
叛變，自開戰以來絕跡無聞；腐敗的軍人，又到處被淘汰。蔣委員長以此次戰事與西安事變相比較，指出『前者賴政府
與民衆態度之堅定，乃能克服一切之困難，獲得最後之勝利，此次戰事仍本前次不折不扣之精神以赴之，最後之勝利
必仍獲得。』並力言『惟有抗戰始能維繫全國之統一，有精誠團結之國族則強敵雖悍，不足畏矣。』（註十七）廣州武
漢陷落後，因將士的浴血奮鬥視死如歸，民衆的同仇敵愾踴躍效命，越犧牲越振發了抗戰力量，在戰場已取得主動地
位，行動更爲自由。正如白崇禧將軍說：『我要擊東則東向，我要攻西則西進，行動自如，不受約束。這是全面戰術之好處，
敵人儘可深入，然其命運不外如拿破崙之進攻莫斯科，一敗塗地而歸。』（註十八）

在政治方面，也不斷的進展着，武漢陷落後，反而打倒了躍躍欲試的『和平』論調。傀儡的聯合政府，不管日人如
何努力施展他的陰謀詭計，竟毫無結果。而我方在軍隊上，已積極開展了政治工作。如陳誠將軍說：『民國十六年北伐

（註十七） 海通社重慶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電。

（註十八）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某地電。

之成功，多賴於軍隊政治組之工作。惟是役結束後，該項組織即逐漸取消，現爲使中國軍隊得追世界進步，並促使軍民關係愈趨密切起見，殊有擴充陸軍範圍及提高政治工作人員地位之必要，希望能在三年內，訓練政治工作人員五萬人。」（註十九）而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對於統一戰線，作了更進一步的決議。民衆對於抗戰，也莫不再接再厲。將抗戰的利益放在第一，將家族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退到不重要的地位，如廣西鄉下會大娘訓斥獨子，不許逃避軍役，上海青年潘必正夫婦以絕食手段，利用父母愛子熱情，勸服他們對政府捐納巨款。這都是因民族抗戰，才能全國空前的統一，才能發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平時絕不會有如此迅速進展的。

我們的戰爭，到目前爲止，還是失利的方面多，但因我們戰爭的進步性，正要在對於強有力的敵人，作殊死的奮鬥，才能將我們的力量提高起來，發展出來，變成真正的集體的革命力量。（註二十）正像馬克斯對羣衆的指示：『你們將經過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內戰及國際戰爭，不但改變外部的環境，而且爲求改變你們自己，並使你們自己適於運用政治權力』（註二十一）讓我們在抗戰的堅苦奮鬥中，產生了新的偉大的民族，新的偉大的集體力量，來保證並加速打退敵人，建設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一個大集團的新生活。

（註十九）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重慶路透社電。

（註二十） 參看馬克斯法國階級鬥爭，一八四八——五〇，一九三四年（英文版）三三頁。

（註二十一） Marx, On the Communist Trial at Cologne 1851.

論婦女

竟日

將近兩年的持久抗戰已由第一階段漸漸過渡到第二階段，全國上下所遇到的環境更爲艱苦，而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任務也更爲嚴重。在這般急迫的存亡鬥爭中，我們全國同胞，應當如何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貧富尊卑，把生命財產獻給國家，爲民族抗戰而努力犧牲！同時在兩年來的堅苦奮鬥中，已澈底證明了只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才能粉碎敵人殘酷的侵略，才能建設獨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全國婦女在數量上佔全體民衆的半數；在質量上，像蔣委員長在重慶獻金競賽婦女日演講說，『女同胞的力量比男同胞爲強』。倘若不動員全國婦女，就根本不能發揮女同胞的力量，不能與男同胞配合起來，供獻在抗戰建國的神聖任務上。我們要動員全國婦女，不得不檢討婦女的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係，不得不檢討過去中國婦女運動的經驗與困難，然後才能了解與執行當前抗戰建國所付與的任務。

一 國家沒有解放婦女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自從社會上發生私有財產制度以來，女子就被視爲財產的一種，被男子關在家庭裏廚房裏，過着奴隸生活，同時因爲女子的被壓迫，是在家庭中被個別處置的，在奴隸社會是如此，在封建社會也是如此，她們處在被分而治之的狀態

態中，永遠不能聯合起來努力於自己的解放。

婦女解放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開始的。當資本家利用機器，擴大生產，努力爲自己謀利的時候，生產分工越來越細，在全部生產的技術關係，固然越來越複雜，但在各部分的生產過程，則越趨簡單化，可以雇用大量沒有訓練的工人，參加工作。沒有訓練的女工與童工，因爲工資比男工便宜，更可受資本家剝削，於是便爲資本家的利益計，女子漸漸有參加社會生產的機會了。

同時，因爲資本家擴大各部分的生產事業，增加商品，無形中將女子在家內應做的事情，漸漸由社會代替執行，使她們可以多有時間出來參加生產。譬如在歐美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家庭工業破產，紡織的事務，本來由家庭女子自己做的，後來覺得自己紡織，太不經濟，不得不交給社會的紡織工廠去專施其事。麪包本來也是家內主婦自己做的，而社會上麪包房的增加，又給了婦女們不少便利，按美國一九三〇年的調查，在農村家庭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家，自己做麪包，而在城市裏，只有百分之一的家庭，不買麪包房的麪包了。（註一）罐頭食物，有罐頭公司替家庭主婦代做了，洗衣服有洗衣作，而丈夫兒女的衣服也由公司做好了發買。煤氣公司減輕女子的烹飪的職務，電氣公司減除了婦女擦油燈的麻煩，並且還可幫助掃地。以上種種事業，雖然全因爲資本家爲謀個人私利而發展，但其社會的影響，無形中減輕了婦女在家庭的担負，給她出來參加社會生產的機會。

還有，因爲資本家對於男工，進行着殘酷的剝削，使他們的工資，不足以養活家庭，不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強逼着他們的妻子兒女，也出來一同受資本家剝削，所以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參加工資勞動的，只有寡婦孤兒和無

註一 Ogburn, W. F., *The Family and its Functions*,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N. Y. &

London, Mc Graw-Hill Book Co. 1933 Vol I p. 664.

所寄托的婦女。在十九世紀，則大約半數的女工，已是夫之婦了。（註二）

以上種種原因，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們，漸漸離開了家庭，到社會上來謀生。而隨着資本主義來的政治運動，就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招牌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映在婦女運動的，就是婦女參政運動，性的自主運動，教育運動等等。但是婦女解放運動，在勞苦大眾不得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與民主政治一樣不徹底的，不能成功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不能解決，社會是不能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要婦女參加社會工作，根本目的是在乎剝削，並不是提高婦女地位。用得着婦女的職業，就開放給婦女參加，而有許多職業根本仍舊不准婦女參加。所以婦女雖然可以出家庭裏出來工作，但是直到現在，大部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婦女，還是幽禁在家庭裏。

我們拿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來說罷。根據一九三〇年的人口調查，全國婦女在十六歲以上參加工資勞動的一千人中，只有二百五十三人。這是婦女參加工作史上最高的比例數了。女子工作人員與男子工作人員比較，是一比五。在工作上，婦女是否澈底解放，已可一目瞭然。我們再看婦女工作的種類，我們知道協助家庭與個人的傭工，人數最多，其次是書記，再次是工業，自由職業與商業，以及農業。由此可以看出在婦女的職業中，生產事業並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的還是不生產的家庭傭工。若按其三十年來的（一九〇〇——一九三〇）職業上人數增減而論，則工業上半熟練的職業的人數，所增無幾，而熟練的女工，大部分都是減少了。至於參加政府工作的人員，婦女人數太少而不列入統計了。（註三）

註二 麥柯崙泰，新婦女論生活書店一九三七年，一四一頁。

註三 關於美國女工詳細討論，請參 Breckissridge, S. P., The Activities of Women Outside The

Home,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Vol I pp. 709—750

近年來有一個芝加哥家庭的研究，發現四分之三工作婦女，她們丈夫的進款，不能養家，全靠妻子也參加工作，才能維持。（註四）因為女工工資比男工低，資本家因貪利而多用女工，於是女工增加的結果，是使男工失業。『在美國織物工業地方，有一時期，甚至竟有妻子出外做工，丈夫在家裏照料兒女，管理家事的。在企業家努力採用廉價勞動力的工業都市中，妻子到織布工廠去，丈夫常留在家裏。這許多都市，在某一時代甚至稱爲「她們的都市」。（註五）在這一方面的婦女解放運動，好像與男子對立着了。其實這不過是資本主義矛盾的表現而已，在恐慌期間尤爲顯著。同時，結婚的婦女，在外做工，受資本家的剝削，做完工回家以後，就有許多家務等着她處理。這種婦女，不獨得不到解放，反而受到兩重壓迫。（註六）所以列寧指出：

『很久以前所有西歐自由解放運動的代表們，不僅在幾十年之中，甚至於在幾百年之中，要求取消這些殘廢不堪的法律，要求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平等，但是，無論那一個歐洲的德謨克拉克西的國家，那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都不能實現這一點，因爲在那些國家內，存在着資本主義，在那些國家內，仍舊保存着土地私有制，工廠私有制，在那些國家內，仍舊保存着資本的政權，因此，男子還保存有特權。』（註七）

但等資本主義到了崩潰的階段，資產階級爲着挽救其垂死的命運，一面對外實行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期緩和內部矛盾，一面對內實行法西斯的獨裁，壓迫一切勞苦大眾，而婦女解放運動，不獨不能開展，反而全被摧殘了。希特勒說

註四 參 Monroe, Day, Chicago Families: A Study of Unpublished Census Data, Chicago, 1932.

註五 柯倫泰，新婦女論，一四一頁。

註六 Ogburn, W. F., *Op Cit* p. 666

註七 引自列寧論婦女·女工和農婦，中國出版社，一九三八年第七頁，原文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五六頁。

『婦女的天職是生育子女』宣傳部長戈倍爾說：『男子是支配生活的，女子是支配鍋釜的』，而納粹黨外交委員長盧森堡還說：『實際上，憑良心說這種解放的婦女的生活，完全犧牲了男子的機會罷了。』（註八）根據了這種理論，實行將女子逐出了生產機關，逐出了大學，逼着她們回到家裏做賢妻良母，逼着她們在廚房做奴隸。對她們實行四『K』主義，即廚房，教堂，孩子，衣裳。墨沙里尼也說：『婦女一定要服從，……假使我以選舉權給婦女，有人便要笑我……』婦女都應該留在廚下』（註九）法西斯婦女最重要的職業，是給丈夫做奴隸，努力生育，為國家做侵略的砲灰，那裏還談得到解放？

軍事法西斯化日本的婦女，在『日本法律與習慣並沒有從封建觀念進步了多少。日本女人仍然可以賣買，和商品一樣。就是中等階級的女人，也距奴隸不遠。民法注定了女人的劣等地位；女人不得丈夫的許可，不能簽訂合同；她沒有財產權，她從結婚帶來的財產，只有她的丈夫才能處分；女人不能承產，除非定出特別的辦法；男人不舉出什麼理由，便可把女人拋棄，把她送回娘家，——離婚，也沒有養活她的義務。』但女子『要替她的父親或丈夫犧牲自由與生命，有時甚至為兄弟們籌措教育經費而把女兒出賣。』（註十）當中日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婦女大眾的境遇，也為戰爭所改變了，在生產方面，因為大批工人被徵發到前線去作戰，各生產部門雖然大量吸收了女工，但是她們的情況，不但毫未改善，反而更加慘酷；工作時間增至十幾小時，工資祇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夜間禁止婦女工作的法令，早已廢除。資本家籍口非常時期，趁火打劫的強制，已經到了令人難受的境地。此外還要抽出時間來扮演着送往迎來的悲劇，在路上

註八 引自The Nation, N. Y. Feb. 6, 1935, p. 15。

註九 意大利的婦女，大美報婦女界，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註十 Utley, Freda, 日本女子的社會地位，國際婦女動態譯報圖書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三頁，六七頁。

要綴上千針，爲戰場上日本兵士們，作爲避鎗擋砲的『護符』。有一羣年輕的女子，眼看着丈夫的兵役期滿而沒有歸國。她們向軍部糾纏追索，要組織『索夫團』來華看看自己的丈夫，是否依然健在。而法西斯蒂軍閥，把她們運抵中國戰地時，就將她們盡交『慰安所』編爲營妓。（註十一）

以上婦女被壓迫的事情，正證明了馬克斯所說的『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

二 國家解放以後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真正的婦女解放，只有在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實現。革命以前的帝俄婦女也與其他國家婦女一樣，受社會壓迫的。譬如帝俄的法律有名文規定『妻子當視丈夫爲一家之主，當愛他，服從他，使他歡喜，以及做他的附屬品』（帝俄法律第十冊第一篇第七條）另外還有法律規定（第一〇三條）『妻子必須隨着丈夫』這是說丈夫走到那裏，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她得跟到那裏。

但是革命以後，婦女在法律上就得到絕對平等的地位，而斯大林憲法的第一百二十二條，又絕對保證了婦女的權利。但是列寧指出，專靠法律是不够的，他說：『我們應當盡力使婦女在經濟方面，不受壓迫，不與男子有別。』所以對於做工的婦女，盡力保護，使她們有真正平等的機會。譬如做吃重體力的女工，分娩的時候，有四個月假期，而做輕便工作的有三個月假期，使她們分娩前後有充分的休息。而孕婦到某一時期，則絕對禁止做夜工與多用體力的工作。在電車上火車上，都有孕婦母親與孩子的特別坐位，火車站裏則有特別休息室。婦女分娩以後，有了法律上的休養時期，經醫生證明，確可照常做事以後，即可回到原來做工的地方，而且同事們對她，還要加以特別照顧，因爲她除了職業以外，

又盡了另一種的職務，——給社會主義國家添了一個新國民。各機關工廠，凡是有女職員的地方，就附有托兒所，而女職員得離開職務，按時到托兒所去哺乳。有一次我參觀一個「學生城」，這是住着八千男女學生的大寄宿舍，內中也有托兒所，我很奇怪，心想：「難道社會主義國鼓勵女學生生孩子麼？」後來領我參觀的學生告訴我：「許多學生本是母親。因為要給她們有讀書機會，而且要使她們可以安心讀書，所以學生城便組織了托兒所，請了看護，使母親們也有讀書的機會，不必掛慮她們的孩子了。」

對於婦女問題，蘇聯政府的最驚人的成功，恐怕就是消滅了一個人類長期的罪惡——娼妓制度。在別的國家，幾千幾萬的婦女，為生計所困被逼為娼，而在蘇聯娼妓可說是絕跡了。以前本來的娼妓，在救濟所裏訓練以後，已變成有用的國民，有的變教員，有的變看護，醫生，有的在黨裏任書記，有的已被選為蘇維埃的人民代表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奇蹟！

年老的婦女，同着年老的男子一樣，不必為她們生活發愁，國家就有養老金，為她們預備着這是她們應得的權利，不像別國的年老工人，被工廠開除以後，便求告無門，倘若得着慈善機關的救濟，便以為一生萬幸，感恩不盡了。前幾年，在莫斯科 Peter Alexeyev 工廠裏，有一個年老的織布女工，提出了抗議，因為她被逼着受養老金了。她在工廠會議上說：『是的，我是老了，但我仍能做工，仍能有用於國家。我可以教許多年輕的工人，而我在家休息，就沒有什麼可做了。主要點是現在工作不吃力了，每天只做七小時，時間過得飛快，而一切又有國家保護着。』在集體農莊得養老金的婦女，有許多地方，與年老的男子們，自動組織『工作審查委員會』，幫助農莊審查工作，同時將自己的經驗傳給年輕的工作人員。

女子在家庭中的經濟需要，不必倚靠丈夫，可以完全依靠她們自己的生產工作。同時許多家庭的瑣碎事務，已由

國家負責，如衣服有國家洗衣工廠，食物有國家廚房工廠，孩子由托兒所，幼稚園，兒童電影院，兒童戲院與兒童公園等，使婦女們不爲家事所累，可以安心參加社會生產工作。

在教育方面，女子又有特別機會，去提高自己的資格。每一工廠，就有附設的工廠學校，使婦女們工作前後，可以讀書。許多女律師，法官，藝術家，作家，科學家，與政治家，都是這種工廠學校幫助她們成功的。她們在工廠的預備學校畢業後，只要成績優良就可入大學深造。只要能入大學，就有生活費的貼津，決不會因經濟困難而不能入大學的。

學校不是唯一的訓練所，社會主義的建設，才是婦女們最偉大的訓練所。許多窮鄉僻壤的女子，本來過慣帝俄時代的奴隸生活，現在因爲參加了集體農莊與公共生活，在工作過程中，已把她們的生活，整個改變了，有許多村婦，一躍而爲社會的領袖，下面引的自傳，是 Dagestan 山間村中一個女子寫的：（註十二）

「去年（一九三三）五月間，有幾位斯大林村集體農莊的同志來看我，告訴我，他們要我到蘇維埃的主席。我怕死了，怕得發抖，而且哭了。我對他們說：「倘若你們要我到你們的主席，我就走掉，住在別的村子裏去了。」

「我怕我的能力不能勝任。你知道，我是一個貧農家裏的笨孩子。只有在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讀書，而現在他們要我到「最高權威」全村的主席了。是的，我已做過集體農莊的副主席，而且也是村中與農莊的主席團的一份子。但是要我忽然跳起來做全村的主席，我是不能設想的，不是。」

「我的同志們開始來說服我，而我的哥哥因此生氣了。他說：「你本來一直是高高興興的，而現在你害怕起

註十二 Aïmarova, Baisat, From Serfdom to Socialism. 原文是 Kummik 土話，後來譯成俄文，A. L.

來了。有什麼可怕的你沒有聽見我們農莊的主席 Jemal-Edden Daibor 說他到莫斯科參加集體農莊突擊隊代表大會的事嗎？不知道他在主席團裏與斯太林並坐着，而且聽見斯太林親口說應當政權交給女子嗎？不要怕倘若你不能做的話，我們可以重選別人的，沒有人會捉你起來的。」

「我放心了一點，而不久，他們就選我做主席了。」

「現在我已在農村蘇維埃做了一年多了。當我想着以前哭的情形，我笑起來了。我已知道只要有好的助手，做主席並不是一件難事……」

在她領導之下，加上了農民的幫助，村裏不獨生產增加，而且新添了許多東西如電燈，水管，無綫電，托兒所，絲竹音樂團，醫務處，以及招待外村客人的小客房與爲本村村民的俱樂部。她說：

「我們集體農莊的農民的生活，已進步得多了。他們不獨足衣足食，而且還有文學及娛樂。每一個農家有鐵床，毯子，鏡子與整齊的家具。但是我們還要改進，想把山旁的村中，建造許多大房子。」

「不久以前 Daghestan 黨部書記 Nazmuddin Samurski 同志來看過我們一次，幫了許多忙。他說在秋天我們應當把農村改造爲農城 (farm city) 後來工程師技正們就來計劃了。我們非常開心，盡力設法。集體農莊的農民們已經信託了蘇維埃政權，有幾個本來有預備自己造新房子用的材料，現在如數送給農莊，爲建築農城用了。」

「我們深信我們的新農城不比平常，將變爲地面上的宮殿。他們告訴了我們，而我們自己也知道，這種生活將稱爲社會主義。」

這個例子的意義重大，就在乎這是村婦轉變爲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典型例子。革命以前，所有的勞動婦女中，大

半是家庭的奴婢，傭人，百分之二十五是地主跟富農的女傭，百分之四是醫生小學教員，其餘的則在實業界勞動，女傭或者奴婢佔全體勞動婦女的四分之一。（註十三）可是，在一九三四年的開始，已有六千個婦女做集體農莊的主席，六萬婦女參加農莊的行政工作，二萬八千婦女是突擊隊的領袖，十萬婦女是地方組織者，九千婦女領導着牛奶場，七千婦女是開拖曳機的。七十萬婦女參加工業生產工作，構成全體工人約百分之三十七。若以參加全國經濟建設的婦女們總合起來，有七百萬以上，構成全國工作人員約百分之三七·六。到一九三八年，家庭勞動婦女僅佔全體勞動婦女約百分之二，女教員，女醫生佔百分之二十，在大的工業的企業界裏，在建設的機關中約佔百分之四十……艱難而困憊的奴婢勞動已成過去了。（註十四）現在婦女同男子一樣地往領導國家的，黨的和經濟崗位上邁步。現在國會的副議長，是從前被壓迫的民衆裏邊的女子。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千〇十四代表中，有一百八十九位女代表。一·五一八名婦女被蘇聯獎以獎章。婦女們做工廠的理事長，婦女們做學者，婦女們做超羣出衆的演劇家，婦女們做飛行家，跳傘員，婦女們做紅軍的英雄。這種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婦女們，用一位蘇維埃女代表的話，「已由管家管廚房的職務轉變到管托兒所，管工廠，管城市與管理國家了。」誰能否認「每一個廚子都應當去學習治理國家」的口號，已在很快的實現着。列寧說：

「在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要參加政治必須有特別的訓練。即使在最前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婦女參加政治都是很少，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但是，我們使每個勞工婦女都能接近政治，這是我們的任務。……因爲在私有財產及土地工廠私有制度取消時，地主與資本家的勢力就破壞了，政治的責任對於勞工羣衆就會成爲

註十三 消息報，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社論，譯文見新語週刊第一卷第四期七十頁。

註十四 參全上

很簡單的，並且是人人可以參加的。」（註十五）

是的，蘇聯的婦女，參加國家建設的人數，還沒有與男子一樣平等。這所以每一次選舉的時候，執行委員會號召全國人民，要求多多選拔婦女領袖人才，這所以各地開設專門班來努力訓練婦女幹部。提高婦女地位的任務，不獨婦女們自己在努力，而政府與黨無時不在那裏努力。所以斯太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說：『婦女構成全國人民的半數，她們構成了偉大的勞動軍。而且她們被注定了生育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後代，這就是我們的將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不能讓這偉大的勞動軍遭受黑暗愚昧而坐視不顧。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歡呼勞動婦女增加參加社會事業，而她們上升到領導地位，就是我們文化發展的無庸置辯的信號。』這證明了七十年以前馬克斯說的話，他說：『女性的社會地位，可以用來很準確的度量社會的進步。』

解放婦女，是全國一致的長期鬥爭。只有等到婦女們可以脫離了家務的桎梏的時候，只有等到婦女們在受孕，生產與老年時有了社會充分保護的時候，只有等到婦女們有平等機會享受教育與參加生產工作的時候，總之，只有等到沒有了人剝削人的自由國家的時候，婦女們才能在生產上，在政治上，在其他社會事業上迅速發展着而達到絕對自由絕對平等的地位。

三 過去中國婦女運動的經驗

中國婦女被壓迫的事實，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間斷過，而婦女解放運動，則是隨着民族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運動的抬頭而發生的。這與歐美民主國家婦女運動的發展，相彷彿的，所以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是隨着民主的辛亥革命一

同來的。在當時因爲列強的侵略，打倒了滿清政府威信，打破了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開始產生了民族工商業，而新興的工商市民，爲着本身的發展起見，開始了反清的政治運動，而先進的婦女們，也熱烈的歡迎民主共和國的運動，並且也參加反清的革命。在革命未成功的時候，就有秋瑾女士英勇的奮鬥與壯烈的犧牲。她創辦女報，舉起了男女平權的大旗，這是中國第一種提倡婦女運動的刊物。當武昌革命軍起義的時候，有吳淑卿女士投在黎元洪軍隊中效力，並組織女子軍隊，而「一時成立的女子軍隊甚多，秋瑾的學生尹銳志姊妹組織浙江女子軍，率衆參加杭州之戰，首擲炸彈於巡撫衙門，欲得滿人桂福以復師仇。辛素貞等組織女國民軍及女子決死隊等，當武昌城守備之任，並參加攻擊南京漢口之役。沈警音等募集女子軍團於上海。此外最著名的尙有女子北伐隊，女子軍事團，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等。」（註十六）同時各地婦女，組織了紅十字會與赤十字會，進行救護工作。所以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婦女參加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南京組織臨時政府，而女子軍隊不久即被陸軍部解散，政府並令各省以後不得招集女子新軍。但是被解散的女戰士們，便組織了各種團體，作政治的奮鬥，如神州女界參政同盟會，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同盟會，男女平權維持會等，要求在約法上規定婦女的參政權，並上書請願力辯約法上未規定男女平等之不當，可是她們的要求終於被政府拒絕了，而女子參政運動，亦因此中斷，等到革命結果，被袁世凱軍閥搶奪後，封建勢力抬頭，婦女運動也隨着民主勢力消沉了。

歐戰開始以後，列強無暇東顧，給民族資產階級，以空前發展的機會，反映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就是以民主主義爲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那時主要的目標是以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式的舊禮教。女子是最受封建勢力壓

迫的，所以婦女問題，便成爲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當時對於賢妻良母問題，貞操問題，社交問題，都提出來討論，大致反對女子的被壓迫，以民主主義立場，要求婦女有平等的地位。等到『五四』運動開展，反封建的婦女運動，加上了反帝的性質，不獨主張人權，反抗舊禮教，主張民主反對專制，同時也擁護民族主義，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婦女運動的特質。

這一階段的婦女運動，參加的大多是智識青年男女，他們又受了蘇聯革命成功的影響與鼓勵，對於運動又加上了強大的推動力。在各地組織婦女團體發行刊物，主張『思想革命』『社交公開』『結婚自由』『教育平等』並要求參政權，勞動與職業自由，而勞動婦女，也漸發動參加，開展了婦女運動的基礎。

中國婦女在國共合作以及革命先進的領導之下，產生了許多出類拔萃幹部，深入到廣大的婦女勞動界裏面，爲了民族獨立和婦女解放，而艱苦奮鬥着。在『五四』以後，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高潮中，加緊鍛鍊了中國婦女大衆，『單以上海一地而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來，參加罷工的婦女計達十六萬人』（註十七）而因此婦女們也流了不少的光榮的鮮血，這是中國婦女在革命鬥爭中燦爛光輝的成績。

但是後來國共分裂，民族革命亦遭了很大的打擊，因而婦女解放運動亦受了挫折與分化。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婦女運動的人們，與統治階級配合着，以擁護現狀爲原則，希望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中，得到婦女的解放，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提高婦女地位，她們提倡婦女知識的增進，於是開辦婦女學校，辦婦女雜誌，提倡家事教育職業教育，以中產階級以上的女子爲對象，而爭取些無礙於現狀的婦女權利，如要求婦女參政權，離婚權，通奸起訴權，以及財產承繼權等等。她們以爲這種目的能够達到，婦女地位就能『平等』了。但是大革命失敗以後，統治階級便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妥

協一面以空洞的法律權利敷衍一部分婦女的要求，一面却加緊壓迫勞苦大眾，而婦女大眾當然也被壓迫，談不到爭取女權了。等到國際間法西斯主義抬頭，也反映到中國的婦女運動上來了。同時因為九一八以後，反帝的高潮不斷的澎湃着，於是遣派改良主義者，不得不更進一層，爲維持社會秩序起見，主張婦女回到家庭去，提出了『娜拉』回家問題，做了希特拉的應聲蟲而主張婦女做『賢妻良母』來繁榮民族。甚至前北平市當局禁止男女同學，廣州當局提倡婦女『新四從』並且各地一面提倡節孝的封建道德，一面干涉婦女的頭髮與服飾，來『維持風化』的種種反動。

但是歷史是對立着發展的，一面雖然表現反動，而另一面婦女大眾，却仍舊繼續開展婦女運動，她們在思想上作理論的鬥爭，在行動上團結勞動婦女。九一八以後，各地開展了民衆反日運動，而婦女大眾與女學生在這運動中，也佔據重要的部分。一二八上海的抗戰，婦女們在宣傳與救護的工作更爲顯著。一九三四年七月，宋慶齡何香凝女士與許多名人領導着大規模的簽名運動，開展人民抗日自衛戰爭的組織，發動了不少婦女大眾與學生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一日上海婦女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響應北平的救國運動，並組織了婦女救國會。同時滬東及滬西一帶數十個日本紗廠都實行罷工，罷工人數計達二萬人（主要的是女工）。他們的戰鬥精神非常堅強，充份表示他們不願做殖民地奴隸的決心。日軍當局雖派遣坦克車和機關鎗分駐各廠，但這些工人們毫不畏縮。（註十八）就是窮鄉僻壤的農婦，也被民族抗日運動所鼓蕩而起來了，東三省失陷後，產生了領導游擊隊抗日的『中國游擊隊之母』趙老太太，一九三五年寒假華北學生團體到鄉間作抗日救國的宣傳，聽衆中有一位年逾五十的農婦，站到講台上來發表演說，『我們必須奉獻我們的生命與日本軍閥戰爭，我大中華民族是不能讓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征服的。』（註十九）這

註十八 參婦女生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註十九 見大眾生活通訊，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種例子在全國刊物中，可說不勝枚舉，這都表示婦女運動隨着民族的危機，在各處開展着。

綜觀這二三十年的中國婦女運動，我們得到以下重要的經驗：第一，中國婦女運動是時起時伏的，而且各地自動發展着，沒有廣大的羣衆基礎，也沒有嚴密的組織，我們知道，沒有廣大的羣衆，沒有嚴密的組織，是沒有力量的。所以婦女運動雖有部分的成績，但對於整個婦女全體的影響，還是很微細的。雖然以前蘇區對於婦女有普遍的組織，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婦女領袖（註二十）但由全國而論，這也不過是部分的現象。第二，婦女運動的不能充分開展，反映着整個民族的沒有出路。首先婦女運動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配合着的，後來民主運動失敗，婦女運動也遭了嚴重的打擊。九一八以後，民族遭了空前的危機，婦女運動反映着抗日呼聲，但是所有的也不過是呼聲而已。因為婦女運動不與整個民族解放鬥爭切實配合起來，不能單獨前進的。正如總理指出：『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個人爭自由，忘記了國家的自由，要曉得國家沒有自由，個人就不能有自由』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也鄭重述說：『國家沒有解放，我們全國的女子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註二十一）全國婦女要爲自己爭取自由，首先得聯合起來，去爭取民族自由。但是，對日抗戰，爲民族自由開展了光明的大道，同時也決定了中國婦女運動的新任務。

四 中國婦女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任務

在這兩年來的民族解放革命戰爭中，婦女們確已發揮了很大的力量，而婦女運動也隨着邁進。八一三以後，首先造成了國共統一戰線，團結了全國各黨派各階層的力量，一致努力抵抗強敵，而本來分化的婦女運動，也團結起來與

註二十 參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三章婦女和革命，一九三九年香港復社出版。

註二十一 蔣夫人在三八紀念會致詞，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重慶電。

整個民族抗戰配合着邁進了。參加工作的婦女們有太太，少奶奶，小姐，學生，歌女，女工，農婦與家庭婦女等等，而工作的範圍也很廣泛。在反漢奸方面，例如傀儡王克敏的女兒，宣佈脫離父女關係；蘇州有女子發現丈夫把軍隊情報給敵人，勸阻無效，即大呼『賣國賊』，把他送警究辦；廣州有女子，因為丈夫於廣州失陷後，要出來担任偽維持會會長，屢勸不聽，便毅然毒死丈夫，雖遭敵人慘殺，毫無畏懼。在慰勞與救護方面，有勞働婦女與女學生，參加前線救護慰勞工作，各地工廠女工與鄉間農婦，或看護傷兵，或替傷兵担任縫紉和洗滌工作，並且後來成立了『婦女界慰勞前線將士會』，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担任會長，號召全國經募現款及供應物品。而何香凝女士，領導着二十二個婦女團體，共同積極的參加後援工作。此外有許多婦女參加救濟難民與養育難童。至於動員財力工作，上海婦女會踴躍輸將，推銷救國公債的成績，達一百另三萬餘元，重慶獻金競賽婦女獻金日，一日間得到七十餘萬元。各地有許多女工農婦會將自己結婚時所有之唯一飾物，投入獻金櫃中。而歌女們，又自己組織起來，如『漢口歌女獻金救國會』等，編唱抗戰歌曲，從事宣傳，並開遊藝會獻金。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許多知識婦女與女學生自動組織宣傳隊，下鄉做宣傳教育工作，鼓勵婦女們在火線附近做救護工作，在後方則鼓勵參加生產與墾荒工作。並且在各地出版各種宣傳動員婦女的刊物，如沈茲九女士編的婦女生活，隨着抗戰的過程，由上海移到漢口，再移到四川，不因困難而中止出版。在上海方面有婦女與上海婦女，在浙江金華有婦女戰線，在第九戰區有戰鼓，而在江西省則有婦聲，婦女前哨，浮梁婦女，戰事，婦女與江西，婦女等刊物。至於從軍方面，有年老的婦女，令自己的兒子去入伍保國，如廣西曾大娘令子不許逃避軍役並親自步行三百里把兒子交給軍營，蒙旗婦女羅德懿女士會電令就學之二子直接參加抗戰。江西的婦女更一隊隊的競賽着發動壯丁志願當兵，弋陽一縣就發動了一百五十多名。還有青年婦女自動投軍直接參加抗戰，或在正軌軍中，或在游擊隊中，已有不少作了壯烈的犧牲。此外在組織方面，去年五月蔣夫人在廬山召集各界婦女領袖談話會，邀請各界婦女領袖

商議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工作團體，並決定將一切婦女工作放在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領導之下進行。這些事情，都足以證明全國婦女的覺悟和勇敢，以及她們偉大的潛伏力量，而她們的努力，正是爭取抗戰勝利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像列寧指出蘇俄婦女在十月革命中的偉大的作用一樣，他說：『……婦女在革命中很莊嚴地經過了試驗。沒有她們，我們不能勝利，或者幾乎不會勝利。這是我的觀念。』（註二十二）

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現階段婦女參加抗戰的工作，還只是一小部分先進的婦女，極大多數的婦女，仍舊沒有出來盡她們應盡的任務。並且少數參加工作的婦女們，大多各自爲政，就是在一個地方，也往往缺乏聯絡，因此工作不能有效地開展着，有時幾個婦女團體，大家不自覺的共同在做一件工作，而將許多重要工作，反而放棄了沒有注意到。有的婦女們憑着一時感情的衝動，努力參加工作，而時過境遷，或稍受阻礙，即銷聲匿跡。同時我們常看到組織找不到羣衆，而愛國份子却又彷徨在街頭。這都因爲我們的婦女是在落後的國家中生活着，她們是人民中最受壓迫的一部分，她們不僅是半殖民地的奴隸受到民族壓迫，而且受了幾千年的傳統的習慣，觀念與教育等社會束縛和壓迫，不能很快很好的改變過來。因此在工作上便陷於難於開展，散漫，以及各自爲政的現象。直到現在，只有在江西省的婦女，已有了組織規模，它自省到縣，保甲，建立了有系統的領導機關——婦女指導處。其他各省，都任各地婦女自動的參加，以致工作不能積極的開展着。這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嚴重障礙。正如列寧指出，革命『工作如要達到勝利，不是需要數百的婦女參加，而是要無數百萬的……婦女共同努力』（註二十三）只有先把全國婦女組織起來，才能動員她們，才能使她們發揮偉大的力量，而負起抗戰建國的任務。當『游擊隊之母』趙老太太在漢口的時候，曾被邀參加當地婦女所組

註二十二 引自霍爾，蘇俄婦女一二二頁。

註二十三 同上，一二三頁。

織的討論會。她對於那些婦女們的滔滔雄辯，聽得不耐煩起來了，最後，她突然站了起來喊着：『你們大多曉得中國爲什麼要戰日本，當然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們。但是鄉村中的民衆却都是無知識的。你們與其在這華麗舒適的房間裏面「嘩啦嘩啦」爲什麼不到鄉村裏去和那些民衆們談談呢？』（註二十四）這幾句話，對於現階段的婦女運動，可說是『一針見血』了。

全國婦女，因爲地位，訓練與職務等不同，組織的時候，就有各種特殊的問題，而組織的技巧，亦得隨情形而異。我們對於婦女，可分爲女學生，職業婦女（包括文化界），女工，農婦與家庭婦女等種類。一般說來，女學生，職業婦女，與女工們，在這次抗戰中已有了偉大的貢獻，因爲她們已與社會發生密切的關係，對於社會變動的感覺較爲敏感，而且對於家庭的關係，已不像家庭婦女那樣的密切。同時在求學與工作的過程中，已有了組織的訓練，所以在婦女運動中，就做了先鋒隊。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加強組織，糾正過去的錯誤，在全國各地取得聯絡等問題。最感困難的，是農家婦女與家庭婦女，她們在一生中，幾乎把全部的時間化在家庭瑣碎問題中，與社會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對於抗戰建國問題，根本不甚明瞭，而中國在現階段上，產業未曾發達，一般的家庭事務，不像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有社會來代勞一部分工作。所以動員她們是目前最困難的問題。而她們又占全國婦女的極大多數，在她們那裏潛伏着婦女們的最大力量。如何把她們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是現階段婦女運動最迫切的任務了。

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婦女，她們用不着自己治理家務，本可很容易出來參加工作，但她們因爲生活富裕，知識缺乏，整日把時間消磨在侍候丈夫與自己娛樂。同時我們不能否認，許多男子，即使自己參加了抗戰工作，還沒有除去傳統的習慣，要求他們的妻子，用全力侍候他們，雖然在理智上，他們已知道婦女運動的意義，但是要他們妻子也出去切

實參加，就變成另一問題，就頗費躊躇，而且甚至反對了。在這裏宣傳與教育，是占了極重要的地位，這不獨對於婦女而言，並且也要動員男子，要他們到家裏去幫着動員妻子姊妹，使大家理會『匈奴未滅何以爲家』的意義。在這裏我們更可看出婦女運動，不獨婦女自己應當努力，同時也是男子的責職。至於丈夫成仁妻子殉情等事實，對於抗戰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們要動員她們出來抗敵，去爲國家爲丈夫報仇，使她們對於丈夫的愛情，寓於愛國的行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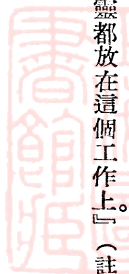
至於對於大衆的家庭婦女，與農家婦女，一面加緊宣傳組織，一面用團體的力量，幫助她們減輕她們的家務，如組織托兒所，改良人民生活等，使她們理會到，參加運動是爲國家，同時也是爲自己。而在組織的過程中，已寓有互助互救與自我教育。

動員婦女，並不是要她們都到前線去作戰。抗戰建國的任務是極其錯綜複雜的，婦女的各種貢獻，是以她們的地位而定的。譬如對於有錢的婦女們，執行獻金與推銷公債等任務，較爲有效。而家庭婦女，則爲軍人做衣服，保育兒童等工作，容易處理了。若接近戰區，則自然着重在救護，在內地則努力於生產。

有了民主化的全國婦女組織，才能使各團體保持獨立性，而更有效地發展本身的力量。同時須有普遍的聯合，使各團體的力量，配合起來，則集體的力量，要遠勝於各團體個別力量的總和。同時在工作過程中，極力選拔婦女幹部，加強運動的指導。在組織方面，雖以婦女自己進行，易於開展，而工作方面，則不必拘泥於男女分工，而有時必須共同配合着發展，方能更收成效。而現階段許多婦女領袖如宋慶齡何香凝諸女士，決不僅是婦女界的領袖，而是領導全國民衆運動的領袖了。

現階段婦女的任務，是決定民族生死國家存亡的任務。不動員婦女，就談不到動員全國民衆。同時，隨着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婦女運動即可空前開展着，所以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說：『在我們的面前，有一個光明希望的未來。我

們團結一致，深信我們所選擇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綫。一切艱難，都可能克服。同時，我們也得到了許多見聞。」（註二十五）
今天婦女們做抗戰建國的一支生力軍，明日婦女就是獨立自由幸福新中國的新公民。但是，高爾基指示我們說：「這種工作是要把人從奴隸制度裏面解放出來，婦女應該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把整個的心靈都放在這個工作上。」（註二十六）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7954B

註二十五 引自史特別，爲自由而戰的中國，一九三九棠棣社出版，二六三頁。

註二十六 高爾基，論婦女，見爲了人類一九三九上海潮鋒出版社，四三頁。

028011

860027

2112
11000

命
民
及
其
他

館
書
圖
人
工
海
上

益
友
圖
書
館

